

---

---

# 日本“超智能社会”

## 数字化老年保障体系建设经验

乔志远 薛泽林

**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在国家财政与社会福利的双重压力下,日本政府对国家养老保障与社会支援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以“超智能社会”为根基建立的数字化老年保障体系最具代表性。日本的数字化老年保障体系包含“家庭、社区、社会”三个层级,家庭方面是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设备普及与指导服务;社区方面是为老年人构建完善、全面的生活保障圈;社会方面是为高新科创产业提供资金政策扶持,推动养老产业市场化的发展。日本数字化老年保障体系的建设经验包括: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社区+家庭”照护体系的建成、智能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以及养老服务人才的梯队建设与专业化培养。

**关键词** 超智能社会 老龄化 养老 数字化

**作者简介:** 乔志远,上海通志馆研究馆员。

薛泽林,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融媒体助推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提能创新研究”(编号:2018EZZ001)。

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带来深刻且严峻的挑战,借力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赋能、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大养老产业投入力度、构建多层次老年保障体系将成为未来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课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sup>①</sup>的总体要求,“对养老产业链条和养老产品服务进行‘互联网+’改造,”<sup>②</sup>构建实时、全面的智慧老年保障体系,是未来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努力方向,在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国内外已有实践经验既必要又迫切。日本是全球老龄化进程最快、老龄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它也是最早依托本土高新科技探索智慧养老路径的国家之一,在这一方面,先行一步的日本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 一、“超智能社会”——日本老龄社会数字化体系建设的根基

超智能社会是日本内阁于2016年1月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的未来发

---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近平的健康观: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 [EB/OL].(2016-8-19)[2021-07-22].<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819/c385474-28650588.html>.

②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智慧养老产业白皮书 2019 [EB/OL].(2020-06-30)[2021-07-22].<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71190.html>.

展概念,这一概念也被简写为“社会 5.0”。根据定义,超智能社会将是“继狩猎社会(社会 1.0)、农业社会(社会 2.0)、工业社会(社会 3.0)、信息社会(社会 4.0)之后的新社会形态”,<sup>①</sup>将对生产、物流、交通、健康、医疗、金融、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发展带来巨大变革,同时也将彻底改变人们固有的生活工作方式。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不足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也将因为“超智能社会”的推进而得到有效解决。<sup>②</sup>

### (一)“超智能社会”的建设背景

“超智能社会”是继英国“高价值制造”、德国“工业 4.0”、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 2.0)之后又一由发达国家提出的未来发展战略构想,主要是为了解决因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需求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正是高龄化、少子化所导致的医疗超负荷、劳动力不足、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保障问题。

近年来,尽管日本政府持续增加投入,但固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国民需要,尤其体现在养老保障方面。日本现行养老保障制度资金主要由“国民年金”、“厚生年金”与“私人年金”三部分组成,国民年金由政府主管并面向全体适龄(20岁-60岁)日本人征收,用于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养老生活,覆盖人数约为7000万人;“厚生年金”由企业与企业雇员共同缴纳,覆盖人数约为4000万人;私人年金主要为商业保险,由企业与企业个人根据实际情况与需求购买相关服务。由此可见,日本现行养老保障制度是以社会公共保险为主导,商业保险为补充的体系架构,充足的适龄(20岁-60岁)、在职国民人口以及由其缴纳的巨额年金是维持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平稳运转的重要力量。然而,受人口结构恶化影响,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正遭受冲击,难以为继。

首先是愈发突出的高龄化与老龄化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日本高龄老年人数(80岁及以上)已超过低龄老年人(60岁-69岁),老年人口数量突破3600万,<sup>③</sup>其医疗、护理、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将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需要大量资金持续投入;其次是单身者与独居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其养老保障成本将完全由社会承担,据推算,到2040年,日本单身人口将占据总人口的50%,<sup>④</sup>由此引发的老后贫困、老后破产、孤独死、心理疾病等问题将成为威胁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养老保障体系需要对该群体适当倾斜,以维护社会稳定;最后是人口出生率呈现出不可逆的下滑趋势,少子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不足与年金缴纳总额的下跌将会严重影响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的稳定运行。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建设“超智能社会”的战略目标,根据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多措并举,以数字化社会发展为基础,实施积极的、可持续的老龄化对策,构建出以“家

① 総務省.平成24年版情報通信白書のポイント[EB/OL].(2012-06-30)[2021-07-22].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4/html/nc112120.html>.

② 古谷知之.日本超智能社会的公共管理范式[J].上海质量.2019,(07):25-26.

③ 陈远.日本实施积极老龄化的策略[J].中国人口报.2020,(10):1.

④ 田雪原,王金营,周广庆.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56.

庭—社区—社会”为中轴,以“健康福利、终身学习、社会支援、就业保障”<sup>①</sup>为主要目标的养老保障体系,力争发掘老年群体潜力,使老年群体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填补现行老年保障体系资金、人力等方面的短缺。

## (二)“超智能社会”的内涵

“超智能社会”具备以下三个核心要素:一是打造虚拟网络与现实世界高度融合、互为融通的社会系统;二是跨越年龄、性别、地区、语言等差异,为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士提供多样且必要的物质与服务;三是以人为本,构建一个人人都能享有高质量生活的新型社会。<sup>②</sup>

“超智能社会”建立在日本通信信息技术、电子器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相关产业的稳定发展之上,其发展蓝图主要由三大数字化系统构成:一是“无人化”,包含无人机运输、自动驾驶技术等;二是“智能化”,包括智能家电制造、物联网技术等;三是“实时化”,包括实时线上交互平台、智能医疗与看护等。<sup>③</sup>这些成熟的、可持续的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提升日本在全球核心领域的产业竞争力,还能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问题,在全面提升公民生活质量与便捷度的同时,也提高了对公共危机与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

2018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未来投资战略2018——迈向社会5.0和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报告书,对“超智能社会”建设提出更为具体的规划。该报告指出,日本将对生活和生产、能源和经济、行政和基础设施、社区和中小企业等4大领域,共计12个方面重点展开数字化建设。其中,针对最为主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问题,日本政府提出了较为明晰的发展路线。<sup>④</sup>

## (三)“超智能社会”在养老领域的基本构想

在“超智能社会”的未来构想中,人工智能与无人化技术将成为长期照护制度的有力帮手,通过对患者生理数据、诊断病历、生活情境等各类信息的收集、处理与系统分析,为每一位受保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实时化的医疗救治和健康指导服务。这些智能服务将大大缓解从业者的人员缺口与工作压力,使其可以专注于宏观性的综合管理与针对性较强的上门服务工作。根据规划,“超智能社会”可在以下两个领域得以实现与推广。

在日常生活保障与护理方面,“超智能社会”计划以庞大的数字化信息库为基础,打造个性化“电子档案”,将每一位老年人的身体情况与基本需求量化为表格进行分析,并由机器人根据对应结果为其提供简单的生活辅助服务,让孤寡老人以及行动不便的居家患者也能得到贴身的照顾,享受舒适的日常生活;此外,该项目还将通过提供实时的生理数据监测和身

① 崔成,蒋钦云.日本超智能社会5.0\_大变革时代的科技创新战略[J].中国经贸导刊.2016,(36):34-36.

② 科学技术振興機構.Society5.0の實現—SDGsが達成された社全を目指して—[EB/OL].(2018-01-10)[2021-07-22]. [https://www.jst.go.jp/pr/intro/sdgs/doc/20170905\\_JSTsympo\\_Keidanren.Pdf](https://www.jst.go.jp/pr/intro/sdgs/doc/20170905_JSTsympo_Keidanren.Pdf).

③ 経済産業省.2017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 [EB/OL].(2017-10-22)[2021-07-22]. <http://www.meti.go.jp/report/whitepaper/mono/2017.pdf>.

④ 内閣官房日本経済再生総合事務局.未来投資戦略[EB/OL].(2018-06-14)[2021-07-22].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miraitousi2018\\_pr.pdf](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miraitousi2018_pr.pdf).

体健康评估,对突发性疾病进行预警与通知,确保疾病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理,减少救治成本。<sup>①</sup>

在缓解医疗负担、改善医疗环境领域,“超智能社会”也将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根据规划,远程医疗将是未来医疗发展的核心领域,针对行动不便、缺乏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目前多由医疗机构派遣相关医护人员与照护工作者携带专业设备上门问诊。但这不仅需要患者承担高额费用,相关医师也会在频繁往返的过程中损耗大量时间与精力,救治效率差强人意。远程医疗可以有效缓解这两大问题,医师可根据详细的电子档案与实时监测数据进行线上问诊与会诊服务,如遇特殊情况,可由照护工作者将老人送至周边医院接受专业检查,效率可以显著提高;患者也不必承担高额的就医成本,只需保持网路畅通,就能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sup>②</sup>

## 二、“超智能社会”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方面的具体实践

以“超智能社会”发展规划为依据,日本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开展数字化变革,目前以形成“家庭+社区+社会”的三重保障形式,分别对应不同的群体与目标。

### (一)家庭:提供网络教学指导服务,指导老年群体熟悉智能设备

虽然网络与云计算技术在日本发展迅速,但依然有大量老年群体不会使用电脑与智能手机,智能设备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率不高。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21年度《信息通信白皮书》显示,日本60岁以上老年人的智能手机持有率仅为55%,其中达到正常使用频次的仅占19%;功能手机持有率下滑缓慢,维持在34%,使用频次达标率高于智能手机,达到53%;但仍有11%的老年人不曾接触、使用过手机,依然使用座机电话、邮筒、电视、录像机等设备维持社交与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sup>③</sup>

为解决这一问题,打造普及面广、下沉力度强的网络普及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日本互联网教学指导服务由来已久,早在21世纪初期,就已出现政府牵头,由商业公司承接的“老人电脑教室”活动,老年人只需支付少量费用,就可以参加相关课程,学习使用电脑的基础知识;当智能机出现后,以Soft Bank、Docomo、AU为代表的日本通讯企业会在各网点定期举行“手机课堂”,帮助初次接触智能机的老年人、家庭主妇与儿童掌握APP下载、网页浏览、在线购物等基本功能。<sup>④</sup>此外,以熟练运用Ipad、Apple Watch等电子产品为目标的小型课堂也存

<sup>①</sup>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介護報告書:確かな社会保障を将来世代に伝えるための道筋[EB/OL].(2013-08-06)[2021-07-22].<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okuminkaigi/pdf/houkokusyo.pdf>.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厚生労働省.令和3年版情報通信白書[EB/OL].(2021-03-17)[2021-07-22].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honpen.pdf>

<sup>④</sup> 蓝庆新,马蕊,刘昭洁.日本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借鉴及启示[J].东北亚学刊,2018(6):56-60.

在,但并未形成规模。

在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能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基本功能的日本老年人数正在增加。尽管整体普及率提升不明显,尚未达到预期,但从2021年度《信息通信白皮书》相关数据来看,与2010年相比,2021年老年群体在电子商务、收发邮件以及网页浏览等方面的利用率提升了近三倍;此外,社交网络服务也在老年群体中流行开来,利用Line、Skype、Facetime等通讯软件进行日常交流的情况已成为常态。<sup>①</sup>日本总务省消费者厅2021年度《手机利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每天使用12小时以上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70岁以上老年人在日本全国已突破万人,不仅人数比上次全民普查(2016年)增长20%,<sup>②</sup>还出现了开发Iphone程序与在Youtube、Twitch等视频平台从事直播工作的事例。<sup>③</sup>

## (二)社区:打造“30分钟”救治保障体系,加强从业人员素质培育

家庭可通过数字化建设与人工智能提供无人化服务,解决生活困难,但作为连接老年人与社会的重要桥梁,社区综合照护体系依然要培养大量照护工作者,以满足老年群体的服务需求。考虑到熟练运用智能设备需要大量的时间与实操经验,而近半数老年人依然处于刚刚接触智能手机与网络的状态,所以日本社区并没有因为数字化的普及而在短时间内大幅降低人工服务的财政支出与服务质量,而是在维持原有服务的基础上提供线上服务渠道,以“双轨制”的运维模式提供更加实时、便捷、个性化的服务。

根据“超智能社会”规划,社区综合照护体系的改善主要集中在“互助”与“共助”两大领域,其中的核心内容为将家庭、社区整合在一起,打造“30分钟日常生活圈”,以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为基础,为圈内老年群体提供居住、医疗、照护以及生活支援等服务。“30分钟日常生活圈”是指普通人30分钟内通过步行可以抵达的区域范围,总体面积约为12平方公里。<sup>④</sup>根据这一标准,一座城市可被划分为若干片生活圈,再根据各生活圈内老年群体的人员数量划分层级,并配备不同功能。如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区域,生活圈内需配备大型综合性医院、养老院与老年公寓;老年人口占比较少的区域,则需配备具有急救功能的社区医院等。此外,相关公益机构组织、社会团体与养老企业可也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开展工作,提供相关服务。<sup>⑤</sup>

目前,政府主要提供居家帮助服务(服务人员访问老人住家,提供洗浴,做饭,清洁等日常生活和家务帮助服务)、短期入住(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进行短期入住,并接受各种照护服

① 厚生労働省. 令和3年版情報通信白書 [EB/OL].(2021-03-17)[2021-07-22].<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honpen.pdf>

② 厚生労働省消費者庁. 携帯電話の利用状況に関する意識調査結果 [EB/OL].(2021-06-29)[2021-07-22].[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757749.pdf](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757749.pdf)

③ 腾讯网. 日本81岁老人成为全球年龄最大的开发者 [EB/OL].(2021-04-21)[2021-07-22].<https://new.qq.com/omn/20210421/20210421A02QFD00.html>

④ 张继元.社区福利核心概念和发展路径的中日比较[J].社会保障评论,2018(3):133-147.

⑤ 豊島康子,立石宏昭.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のすすめ——これからの保健・医療・福祉[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

务)、日托服务(老年人白天去介护机构,接受洗浴,饮食,聚会,动作训练等服务,夜晚回家)等服务内容,主要由照护工作者与家庭成员协作完成;<sup>①</sup> 养老产业从业者根据市场实际需求提供各类高龄者公寓与福利设施,如根据付费金额等级划分的“轻费”老年之家(指以老人可以根据自身收入与身体情况,以较低金额购买不同套餐,享受不同等级住宿、餐食服务的养老院,多不提供护理服务)与付费老人之家(多提供护理服务)等;社会组织多以单一疾病与群体为中心开展相关服务,如根据病情划分的痴呆症老人机构“GROUPHOME”与无自理能力老人机构“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等。<sup>②</sup> 志愿者主要承担组织老年人参加活动、与老人聊天、散步等慰藉老人心理、提升老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服务,以弥补政府、社区、市场的不足。

由于生活圈救治保障体系的有序运转需要有经验、有技能的一线从业者,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也是重中之重。目前,日本政府除沿用 1987 年颁布的《社会福利士和介护福利士法》中对养老服务领域的相关工作者的具体要求,以“院校学习+资格考试+实习培训”的流程培养社会福利士与介护福利士之外,还推出了多种养老执业国家资格认证考试,形成更加多样、丰富的养老人才培养选拔体系,为老年人的日常护理和专业护理提供保障。<sup>③</sup>

### (三)社会:加大高新企业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养老产业市场化发展

虽然“超智能社会”养老规划中需要大量照护从业者在社区工作中发挥效用,但作为人力资源短缺的国家,日本在养老领域所能投入的人力是有上限的;此外,不断上涨的养老人数也必将增加社会整体负担,照护工作者也更应该关注失能与高龄老年群体,拥有基本自理能力与清醒意识的老年人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以自理为优先。因此,日本政府大力扶持高新科技企业,希望其研发的科技产品能够为拥有自理能力的老年群体提供便利,从而解放更多照护工作者投入到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尚不能解决的工作中去。“超智能社会”丰富了这一概念,政府将对以无人机、全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智能化、自动化产业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开发进程,以全力应对老龄化问题。根据规划,日本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将在 2025 年达到 2.6 万亿日元,到 2035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5 万亿日元。<sup>④</sup>

日本养老产品设计的核心为“顺应”——与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让老年人学习使用高端、精细、符合年轻人使用习惯的智能设备,不如尽可能降低学习成本,顺应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与节奏,从细节入手,进行智能化设备的设计与改造。近几年,养老相关科技成果已初具规模,除移乘搬运、移动辅助、步行助力、自动排泄处理、健康监测、走失监视等高新科技产品以外,马桶扶手、坐式淋浴、升降橱柜等尽可能贴合老年人实际需求的改造类产品也应运而生,

① 小岛克久.日本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和社区综合护理体系[J].社会政策研究,2017(6):3-14.

② 日本智慧养老典型:松下真心香里园[EB/OL].(2019-02-22)[2021-07-22].[http://jssb.njnews.cn/html/2019-02/22/content\\_61745.htm](http://jssb.njnews.cn/html/2019-02/22/content_61745.htm).

③ 高建,班晓娜.日本社会福利人才培养:经验与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14,(23):34-36.

④ 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科学技术指標 2017 [EB/OL].(2017-11-30)[2021-07-22].[http://www.nistep.go.jp/wp/wp-content/uploads/NISTEP-RM261.FULL\\_J.pdf](http://www.nistep.go.jp/wp/wp-content/uploads/NISTEP-RM261.FULL_J.pdf).

让老年人在不增加学习负担的情况下尽可能自主、安全地生活。<sup>①</sup>

如今较为成熟的养老智能化产品主要集中在出行与家居生活两大领域。在出行方面,针对老年群体自驾问题,日本政府推出“安全驾驶支持车认证”,要求在日出售的汽车需进行安全技术分类。其中,以老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的汽车必须安装油门误踩抑制系统、自动刹车等主动式安全设备,在获得安全认证后方能进入市场。这些安全设备可以有效避免老年人因分神、视力不清、打瞌睡等问题引发交通事故,尽可能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与财产损失;<sup>②</sup>针对老年群体独自外出问题,日本企业研发出智能轮椅、智能拐杖等辅助设备。智能轮椅不仅可以通过声音与手柄进行遥控,还能在上下坡时自动保持匀速慢行;智能拐杖则可根据路面情况感知障碍物,提醒老人主动规避的同时,将老人定位与行走路径通过网络实时传导家属电脑、手机之中,方便家属随时确认查看。<sup>③</sup>

在家居生活方面,相关产品主要以维持日常生活所需为目标进行设计与研发:如为握力较弱的老人设计的马克杯,设计材料为轻质量的树脂,方便使用者持握;清洗时,该马克杯会始终漂浮在水面上,清洁方式也较为简单。此外,将互联网与家电相结合的产品也广为应用,如松下电器与富士通联合开发的智能空调,可以监控就寝老人夜间起床次数并将相关数据传递给老人的照护人员;夏普开发的智能微波炉则具备对话分析功能,并依照老人饮食习惯与禁忌提供健康食谱。<sup>④</sup>

此外,在“超智能社会”的规划中,养老护理机器人研发也是重点之一,目前已有多家日本科技企业参与到此项目中。根据设想,它们不仅需要帮助老人完成外出、进食、如厕、洗浴、清洁、搬运、服药等任务,还要承担起情感陪伴与健康预警的职能。<sup>⑤</sup>

### 三、日本“老龄社会”数字化本土探索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不难发现,日本“老龄社会”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日本政府在社会、企业、社区、家庭等多领域构筑的厚实根基,在此基础上,“超智能社会”才得以稳妥落地与实施。综合来看,以“超智能社会”老年保障体系为模本,在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修正与完善,不失为一条实现养老产业快速成熟的捷径。日本“超智能社会”数字化老年保障体系的发展路径与整合策略对我国养老服务发展带来以下四点启示:

#### (一) 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日本养老政策是持续的、一以贯之的,这是养老保障体系得以顺应时代需求,不断完善、

① 韩振秋.人口老龄化与科技创新关系研究述评与优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10):80-84.

② 任素娟.日本智慧养老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J].未来与发展,2021,45(04):57-60.

③ 姚东旻,宁静,韦诗言.老龄化如何影响科技创新[J].世界经济,2014,40(4):105-128.

④ 刘英威,陈胜良,潘慧.日本康养政策变迁及启示[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9,32(05):49-53.

⑤ 乌力吉图,周威.日本护理机器人“产学研”协同创新实践模式——以 PALRO 护理机器人为例[J].日本问题研究,2021,35(01):21-31.

升级的基石。日本养老体系发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从 1963 年颁布的《老年人福利法》到 2000 年照护保险制度的施行,日本政府由点及面,以“老年人定期体检制度”、“家庭派遣服务员制度”与“养护福利机构”为支撑,对整个体系进行了标准化和规范化改造:一是构建养老金、国民健康保险、照护保险三种保险制度互为支撑的养老体系,从制度上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二是分离医疗费用与照护费用并大力提倡居家养老,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三是明确界定政府、社区、照护工作者与老年群体之间的责任和权力,并引导、扶持社会力量介入养老工作;四是为投身养老产业的企业提供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优惠政策,鼓励其为老年群体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产品与服务。<sup>①</sup>

国家对养老政策的不断调整、改革与完善是确保养老服务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超智能社会”作为建立在照护保险制度上的新体系,其诞生也离不开国家对养老政策的扶持与帮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具备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目前,我国虽然通过《中国老龄事业“十三五”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打造惠及全民的医养结合服务保障体系,但在法律规定与财政支持方面仍留有空白,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与方案。考虑到我国老龄化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应抓住珍贵的制度初创的窗口期,建立起全面、有效的数字化老年保障体系,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 (二)“社区 + 家庭”照护体系的建成

在照护制度的不断铺陈开展下,以社区、家庭为中心的地方养老体系逐渐形成。该体系由家庭成员、照护工作者、志愿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养老产业从业者等构成,以老年群体心理、生理状况为中心,根据其消费习惯、消费水平、消费偏好、消费领域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老年保障服务。

与西方相比,东亚人更注重家庭观念,希望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社区 + 家庭”制度正是这一理念的延伸,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通过专业化、多样化服务提升居家老人生活质量的一种科学模式,并呈现出“规模小、功能多”的特点。这种养老模式不但可以减少家庭养老负担,而且满足了老年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及尊严需要,并且居家养老可以缓解养老设施的不足,将剩余资金投入更契合老年人需求的服务之中。日本和欧洲都曾经经历养老院从大型集中式向小型社区式的转变过程,事实也证明,这种模式不仅更受欢迎,也更加合理。

目前我国养老模式主要分为“养老机构主导型”、“医疗机构主导型”与“家庭自我管理型”三种较为独立的模式,彼此之间的联系度与协作度不深。再加上三种模式与社区也较为疏离,使得社区养老保障体系始终难成气候,继而导致政府缺少全面深化改革基层养老制度

---

<sup>①</sup> 地域における医療及び介護の総合的な確保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 [EB/OL].(2014-06-25) [2021-07-22].<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401AC0000000064>.



与体系的媒介。<sup>①</sup>我国需重视社区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布局建立以社区为中心、以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家庭为载体的老年保障服务体系,以实现政府对养老工作的统筹管理与资源调配;此外,参考日本将医疗、保健、福利服务整合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的情况,我国也可考虑设立类似的专项管理与决策部门,通过明确部门职能与划分权责范围,减少相关的交流成本与资源浪费,以“高效服务”为推手提升老年保障体系的发展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超智能社会”倡导无人化与智能化,但日本社区与社会福利组织并未因提供智能化服务而短时间内大幅减少照护服务的投入与质量,这一点值得我国相关公共服务机构予以重视——智能设备对于多数老年人而言具有较高的使用门槛,更何况我国有着大量刚刚经历城市化和现代化服务的中老年人群,对他们而言,人工服务要比智能设备更加亲近、可靠。

### (三)加大智能产品研发投入

以企业为主体的智能产品研发不仅对养老数字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可行性与发展前景也是十分可观的。根据预测,日本养老将于2025年进入护工严重短缺的境地,在不大量接受移民的前提下,用机器人与智能设备逐步替代人力已成为最具发掘潜力的养老模式。为此,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机器人技术与开发,尤其是在医疗机器人研发设计领域投入了近70%的研发资金。考虑到我国也正处于老龄化与科技水平同向高速发展的阶段,借鉴日本经验,在加强网络基础建设的同时,加大对智能起居、健康监护、生活护理、康复辅具等智能设备研发与推广的扶持力度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一方面,成果迭出的智能养老产品可以提供适宜老年人生活的居住环境,极大程度地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养老产品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构建产业链的同时带动就业。

通过分析日本在智慧养老方面着重关注的研发方向(医疗支援、生理数据监测、健康护理、生活辅助等),可以大致得出日本老年群体最为迫切与重要的生活需求;而智能汽车、智能住宅的实验性改造,更是为下一阶段的数字化养老发展方向提供有价值的探索路径。值得一提的是,在设计过程中,研发人员不仅邀请老年群体参与产品测试,其自身也会通过佩戴负重沙袋、震颤模拟器、特制眼镜等设备亲身体会腿脚不便、四肢颤抖、视觉退化的老年人在使用相关智能设备时存在的潜在困难。这种研发理念也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目前,我国在养老智能化、数字化领域加大投入,《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中就有“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能够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sup>②</sup>的规划,对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但参考超智能社会的发展情

<sup>①</sup> 邓大松,李玉娇.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制度理性、供需困境与模式创新[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06-112.

<sup>②</sup>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17-02-28)[2021-07-2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06/content\\_5173930.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06/content_5173930.htm).

况,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化、智能化并非对既有养老体系的替代,而是一种补充——智能养老体系的出现并不能完全替代固有养老体系或淘汰相关从业人员,而是借助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使得老年群体获得更优质的生活体验,相关从业者也可以通过更加高效的方式进行工作,最终营造和构建起一个面向全体人员的“以人为本”的生产、生活空间。

#### (四)建立资格制度,提升专业化水平

以“超智能社会”为代表的数字化养老体系是日本政府着力打造的新发展概念,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在数字化养老体系实现以前,仍需要大量具备专业护理能力的照护工作者去填补养老工作的大量空缺。日本政府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不仅从政策上鼓励年轻人投身养老产业,也积极与相关院校与社会组织共同培养专业照护人才梯队,“数量”与“质量”齐头并进,提升照护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如今,日本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已从最初的“社会福利士”与“介护福利士”扩展为“医师”、“看护人员”、“介护人员”、“理学疗养士”、“作业疗法士”、“机能训练指导员”、“生活相谈员”、“介护支援专门员”等8个职种,且都有相应的资格等级认证机制及培训机构,全面覆盖养老领域的方方面面。<sup>①</sup>此外,各区域地方政府还积极挖掘当地潜在人才资源,鼓励低龄老年人、家庭主妇等接受相关培训,扶持具有一定养护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可以顺利就业。尽管人力缺口依然庞大,但成熟的养老人才培养体系依然确保每年都有新鲜血液进入行业之中,在待遇、福利均有所提升的情况下,从业人员也开始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237—249万人的规模。<sup>②</sup>

专业且充足的养老人才梯队是实现数字化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而日本目前所采用的“专业学习+工作实践+技能培训”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正是人才梯队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目前只有医生、护士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较为成熟、完善,养老护理方面的人才培育体系仍存在专业化程度低、从业人员短缺等问题,亟需提高整体的专业化程度与人才培养名额。<sup>③</sup>为走出这一困境,我国可参考日本养老产业的多工种协作机制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与民众所需的养老服务人才专业培训与人才培养体系;此外,我国应提升养老专业人才与社区老年保障体系的联结程度,不仅要确保专业人才可以进入对口岗位开展工作,也要逐步培养各工种间的协作机制,实现养老保障资源与人才的全面融合。

---

① 任雅婷,刘乐平,师津.日本医疗照护合作:运行机制、模式特点及启示[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23(04):27-34.

② 张继元.社区福利核心概念和发展路径的中日比较[J].社会保障评论,2018(3):133-147.

③ 朱启超,王姝.日本“超智能社会”建设构想:内涵、挑战与影响[J].日本学刊,2018(02):60-85.

---

---

# 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刍议

安成日 朱洪兵

**内容提要** 二战后,竹岛(独岛)的领有权问题一直是日韩两国之间的重要争点。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日本官方一直坚持认为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上看竹岛(独岛)都是属于日本的领土。韩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地理和国际法的角度上看独岛(竹岛)都是韩国的领土,并一直实际控制着该岛。韩国政府认为,独岛不存在领土纠纷,更不能被纳入外交谈判或试图以国际司法手段来解决。1994年随着《国际海洋法》即将生效和1965年签订的日韩《渔业协定》的到期,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的争端再度掀起新一轮高潮,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2005年日本设立“竹岛日”、2008年日本在初中历史教科书指导手册中记述“竹岛”为日领土之后,日韩两国竹岛(独岛)纷争进一步升级。如何处理竹岛(独岛)领土争端不仅事关日韩两国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到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 竹岛(独岛) 领土争端 国际法 日韩关系

**作者简介:** 安成日,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朱洪兵,江苏省射阳县高级中学教师,黑龙江大学世界史硕士毕业。

竹岛(独岛)是日本海(韩方称“东海”)中的裸岩群岛,“竹岛(Take Shima)”是日本方面的称谓,“独岛(독도‘Dokdo 或 Tokdo’)”则是韩国方面的称谓,欧美国家则一般称之为“利扬库尔岩(Liancourt Rocks)”。竹岛(独岛)位于日本海(韩国称“东海”)上的北纬37° 14′ 26.8″,东经131° 52′ 10.4″ 和北纬37° 24′ 07.78″ 东经131° 86′ 95.56″;北纬37° 14′ 30.6″,东经131° 51′ 54.6″ 和北纬37° 24′ 18.33″ 东经131° 86′ 51.67″ 之间,是由两个大一点的岛屿和89块岩礁组成的小型群岛,其总面积为186173平方米(见表1)。其中位于最东边的大的岛屿称之为“东岛”(日方称“女岛”),位于郁陵岛一侧的称之为“西岛”(日方称之为“男岛”)。“西岛”呈现椎体状,海拔168.5米,“东岛”比西岛稍低一些,海拔98.6米,东西两岛之间还隔有一条160米长、330米宽的水道。<sup>①</sup>它距韩国东海岸为约215公里(一说约217公里),与日本岛根县惠云的距离为约212公里(一说约211公里),因此,可以说竹岛(独岛)位于距离日韩两国本土大体相等的位置。但它距韩国郁陵岛的距离为约92公里(一说约88公里),与日本隐岐岛的距离为约160公里(一说约158公里)。<sup>②</sup>

---

① 金柄烈、内藤正中『竹島/独島:史の検証』岩波書店、2007年、119頁。

② 金学俊著、保坂裕二訳『竹島/独島:韓国の論理』論創社、2007年、16-17頁。

表 1 竹岛(独岛)面积

	东岛(女岛)			西岛(男岛)		
	面积		标高	面积		标高
本 岛	64698㎡	19605 坪	98m	91740㎡	27800 坪	168m
附属岛屿	6075㎡	1841 坪		19855㎡	6017 坪	
附属岩礁	805㎡	244 坪		3000㎡	909 坪	
小 计	71578㎡	21690.30(21690? )坪		114595㎡	34725.06(34726? )坪	
合 计	186173㎡[56416.36(56415.36 坪之误? )坪](56416 坪? )					
海岸线	1.9km			2.1km		

资料来源:金学俊著、Hosaka Yuji 译『独島 / 竹島: 韓国の論理』(増補版)論創社、2007 年、18 頁。

注:原文小计和合计的数字对不上,括弧内数字为笔者重新合计数。1 坪 = 3.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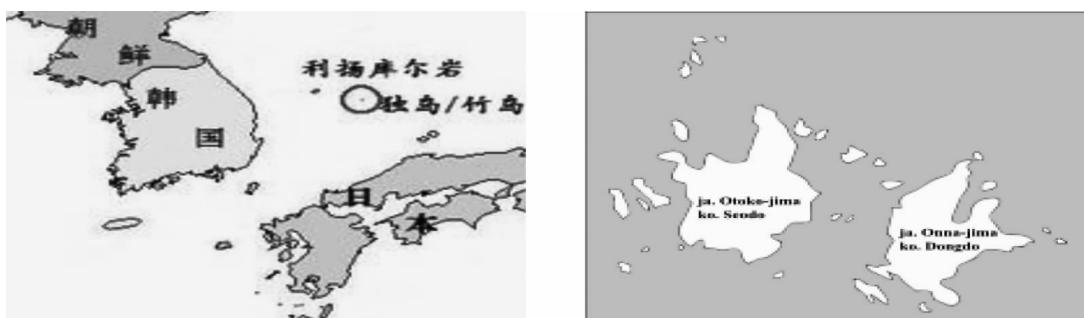


图 1 竹岛(独岛)在日本海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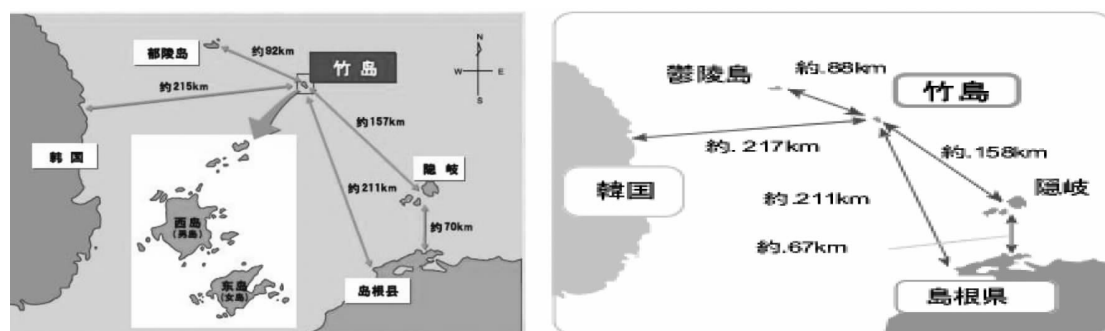


图 2 竹岛(独岛)与韩国、日本的距离示意图

左图资料来源: 外務省、『竹島問題を理解する十ポイント』、[http://120.52.73.79/www.cn.emb-japan.go.jp/territory/takeshima/pdfs/takeshima\\_point.pdf](http://120.52.73.79/www.cn.emb-japan.go.jp/territory/takeshima/pdfs/takeshima_point.pdf); 右图资料来源: 外務省、「竹島」、<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keshima/index.html>

一直以来,竹岛(独岛)被人们视为郁陵岛的附属岛屿。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总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曾明确规定由南朝鲜美军军政厅管辖独岛(竹岛)。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独岛(竹岛)与其他韩国领土一同自动归属于大韩民国,并由其行使主权。1952年1月18日,韩国李承晚政权发表《关于邻接海洋的主权宣言》,将独岛(竹岛)纳入韩国“邻接海洋”范围之内。<sup>①</sup>对此,日本曾提出抗议。此后,日、韩两国都相继采取一些措施,申明各自对竹岛(独岛)拥有主权。

1953年5月,日本趁朝鲜战争正酣之际,曾派兵一度占领了竹岛(独岛),并在岛上设立领土标识牌,但同年7月12日,被洪淳七率领的韩国义勇队赶走。至此,独岛(竹岛)一直处于韩国的实际控制之下。1954年,韩国正式将独岛划归庆尚北道郁陵郡管辖,1956年李承晚政府派出海上警备队从洪淳七手中接管独岛(竹岛)。<sup>②</sup>



图3 独岛(竹岛)的西岛(男岛)和东岛(女岛)图片

注:图片左侧为西岛(男岛),右侧为东岛(女岛),独岛看似有三个“峰”,故古时又称“三峰岛”。东北亚历史财团:日本不知道的十项独岛真相,[http://ch.dokdo.go.kr/pages/s04/page.html?mc=7401&key=&key-word=&category=&bbs\\_id=board\\_ncbbs01&search\\_date\\_start=&search\\_date\\_end=&start=96](http://ch.dokdo.go.kr/pages/s04/page.html?mc=7401&key=&key-word=&category=&bbs_id=board_ncbbs01&search_date_start=&search_date_end=&start=96).

围绕竹岛(独岛)的归属问题,日韩双方都声称对这座岛屿拥有主权。由于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日韩双方的立场针锋相对,二战后日韩双方就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外交战,该问题不时地浮出水面,对两国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 一、从历史记载看日韩竹岛(独岛)的归属

日韩之间的竹岛(独岛)归属问题之争由来已久。韩方一直认为自6世纪竹岛(独岛)就

<sup>①</sup> 安成日『戦後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と朝鮮半島の関係』ブイーツソリユーション(星雲社発売)、2014年、197—210頁,另参见,安成日:《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122页。

<sup>②</sup> 新华资料:“韩国和日本之间的独岛(竹岛)争端”,[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06/content\\_2793036.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06/content_2793036.htm)

已归属韩国,而日方也同样声称竹岛(独岛)是其固有领土。以下拟从历史资料分析日韩各自的主张。

#### (一)19世纪中期韩国官方文献对郁陵岛、独岛(竹岛)的记载

韩方一直声称早在6世纪独岛(竹岛)就归属韩国,以慎镛厦、金学俊等为代表的诸多韩国学者认为,从公元512年新罗智证王时期,竹岛(独岛)就已成为韩国的一部分。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来自大致成书于1145年的《三国史记》的记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第四,智证麻立干十三年条记载:“十三年,夏六月,于山国归服,岁以土宜为贡。于山国在溟州正东海岛,或名鬱(郁)陵岛。地方一百里,恃险不服,伊滄异斯夫为何瑟罗州军主,谓于山人愚悍,难以威来,可以计服,乃多造木偶师(狮子),分载战船,抵其国海岸,告曰:汝若不,则放此猛兽踏杀之。国人恐懼则降。”<sup>①</sup>该史料记录了异斯夫征讨于山国,于山国归服新罗的过程。韩国学者普遍认为,从于山国归服新罗起,于山国的领土包括鬱(郁)陵岛及其附属岛屿独岛(竹岛)已归属韩国。但是,该史料依然无法直接证明独岛(竹岛)已归属韩国。为了证明三国时期独岛(竹岛)已归属韩国,韩国学者援引《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亦称《李朝实录》)《万机要览》等韩国相关史料中对郁陵岛、独岛(竹岛)的记述,作为其论点的旁证。

朝鲜李氏王朝时期由郑麟趾编撰,大约成书于1451年的《高丽史》卷五十八地理志·江原道蔚珍县条中记载,“在県(蔚珍)正東海中……一云于山武陵本二島,相距不远,风日清明则离可见”。<sup>②</sup>另外,成书于1453年的《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五三地理志·江原道蔚珍县条也记载:“于山·武陵二島,在縣正東海中,二島相去不遠,風日清明、則可望見。新羅時,稱于山國,一云鬱(郁)陵島。”<sup>③</sup>另据《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七十二成宗七年十月丁酉条记载,朝鲜王朝成宗统治时期(1469—1494年),也曾经把独岛(竹岛)称之为“三峰岛”,成宗去世以后又重新统一到“于山岛”这一称谓。大致成书于1770年左右的申景潜编撰的《东国文献备考》《疆界考》等著作中也有记载称:“于山島、鬱陵島……二島,一即于山……,輿地志云:鬱陵、于山皆于山國地,于山則倭所謂松島也。”<sup>④</sup>朝鲜王朝纯宗时期,依照国王之命,由沈象圭指挥,徐荣辅等编写,大约最终成书与1808年的《万机要览》军政篇也记载“鬱陵島在蔚珍正東海中…輿地志云,鬱陵、于山皆于山國地,于山則倭所謂松島也。”<sup>⑤</sup>朝鲜李氏王朝成宗时期开始编写,大致最终成书于1530年的《新增东国与地胜览》也记载“于山島、鬱陵島,一云武陵,一云羽陵,二島在縣正東海中,……風日清明,……歷歷可見。”<sup>⑥</sup>该书还附

① 金富轼等编纂:《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第四·智证麻立干13年,首尔奎章阁版。

② 慎镛厦著、韓誠訳『史的解明:独島(竹島)』インター出版、1997年、56頁。

③ 宋炳基『鬱陵島·竹島(独島)歴史研究』新幹社、2009年、18頁。

④ 朴炳涉、内藤正中『竹島=独島論争:歴史資料から考える』新幹社、2007年、295—298頁。

⑤ 慎镛厦著、韓誠訳『史的解明:独島(竹島)』インター出版、1997年、25頁。

⑥ 内藤正中『竹島(鬱陵島)をめぐる日朝関係史』多賀出版、2000年、26頁。

有地图《八道总图》标明了于山岛、鬱陵岛(见图4),但是两岛的地理位置却弄反了,“于山岛(独岛)”画在鬱陵岛西侧。



图4 《新增东国地勝覽·八道總圖》(1530年)



图5 郑尚骥绘制的《东国全圖》(1770年)

资料来源:图4,金恩泽:《朝鲜的领土——独岛》,朝鲜外文出版社,2009年,38页。图5,金恩泽:《朝鲜的领土——独岛》,朝鲜外文出版社,2009年,40页。

随着韩国地图制作能力的提高,进入18世纪以后,韩国绘制的地图已在今天独岛(竹岛)的位置上正确绘制了“于山岛”,由此便可断定“于山岛”就是“独岛”。<sup>①</sup> 朝鲜王朝实学家郑尚骥大致在1770年绘制的《东国全图》就是其中一例(见图5)。此后的韩国地图,大多明确标记了郁陵岛和于山岛的地理方位。如1861年朝鲜王朝地理学家金正浩绘制的《大东輿地图》,1899年绘制的大韩帝国官选《大韩地志》中的《大韩全图》等即为其例(参见图6和图7)。<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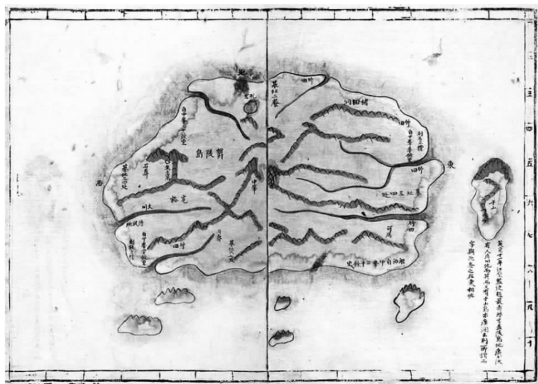


图6 金正浩《大東輿地圖》(1861年)



图7 《大韓地誌·大韓全圖》(1899年)

注:上述两张地图在郁陵岛的东面在现在的独岛(竹岛)的位置上绘有“于山”。

① 慎镛厦:《独岛:为了让全世界的人了解“独岛问题”的16个要点》,独岛协会,2009年版,8页。

② 慎镛厦:《独岛:为了让全世界的人了解“独岛问题”的16个要点》,独岛协会,2009年版,27页;金学俊著、Hosaka Yuji 译『独島/竹島:韓国の論理』(増補版)論創社,2007年,117頁。

韩国学者普遍认为上述古代文献已经清晰记载了郁陵岛与独岛(竹岛)的关系,这说明独岛(竹岛)自古就是韩国的领土。对此,日本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韩国古文献中的“于山岛”很可能就是郁陵岛周边的“竹屿”,而不是竹岛(独岛)。慎镛厦等韩国学者对上述韩方史料进行缜密的考察和推敲后认为:郁陵岛周边的小岛,三仙岩、观音岛、竹屿距离郁陵岛海岸很近,不用“风日清明”也可直接看到。需要天气晴朗时才可以肉眼望见的只有独岛(竹岛)<sup>①</sup>(参见图8),而且在《万机要览》《东国文献备考》等史料中也明确记载“于山则倭所谓松岛也”。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判定于山岛无疑就是今天的独岛(竹岛)。



图8 郁陵岛和独岛(竹岛)肉眼可相互对望

注:左图为在郁陵岛可以用肉眼观测到的独岛(竹岛),照片正前方模糊的岛屿即独岛(竹岛)。右图为从独岛(竹岛)观测到的郁陵岛。

韩国学者经过缜密的推敲和考证,认为韩国史料中所记载的羽陵、芋陵、武陵、蔚陵、茂陵等岛名应是现在的郁陵岛韩国语方言的(울릉도, Ulleung-do)汉字标音记录,而于山岛(在韩国的一些古文献中也有把“于山岛”误记为“千山岛”“子山岛”等)、三峯岛、可支(韩国语“가지”意为“海狮”)岛等就是指现在的独岛(竹岛)。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可否认,韩国史料中对郁陵岛和独岛(竹岛)名称记载是比较混乱的,对于郁陵岛和“于山岛(独岛)”的具体方位也是模糊不清的。三国、高丽时代到朝鲜王朝郁陵岛被称之为羽陵、芋陵、武陵、蔚陵、茂陵等;独岛(竹岛)则称之为“于山岛”,朝鲜王朝时期又称之为于山岛、三峯岛、可支岛等。因此,在《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八道总图》中甚至出现了颠倒上述两岛方位现象。由于绘图技术水平的限制,韩国古文献中的地图大多是“会意”性质的地图,所以岛屿的地理方位和离岸距离等并不十分准确,所以在郁陵岛周边尚存在其他小岛的情况下,“于山岛”即为“独岛(竹岛)”的结论依然难免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有一点是较为清楚的,早在15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韩国人已经知道了在朝鲜半岛东边的大海上有两个较大的岛屿。在朝鲜半岛东部海面上除了郁陵岛和独岛(竹岛)两个较大的岛屿以外

<sup>①</sup> 慎镛厦著、韩诚译『史的解明:独岛(竹岛)』インター出版、1997年、56-57页。



没有其他更大海岛的情况下,不管在历史上其称呼如何变化,古代韩国文献中所指的“風日清明,歷歷可見”的两个岛屿可能就是郁陵岛和独岛(竹岛)。

## (二)19世纪中期以前日方资料对郁陵岛、竹岛(独岛)的记载与日韩独岛(竹岛)之争

日本关于郁陵岛的记载,最早见于《权记》。《权记》载,1004年“高丽藩徙,芋陵岛人漂至”。同时,日方在遣送上述漂至的11名郁陵岛人时,又记载道:“高丽藩徙之中有新罗国迂陵岛人”。对上述同一事实记述中该书还称:“新罗宇流麻岛人至,宇流麻岛,即芋陵岛也。”<sup>①</sup>这一记载表明,日本人早在“中世”就知道高丽已取代新罗的事实,自新罗时期开始郁陵岛已属于现在的韩国。另外,郁陵岛人既然都能漂流到日本,在几百年的漫长的渔猎生活中漂流到竹岛(独岛)也是不难想象的,更何况竹岛(独岛)作为郁陵岛的附属岛屿还处于晴朗之日在郁陵岛可清晰望见的距离!人类有与生俱来的探险精神。对肉眼能够望见的地方总有一探究竟的欲望和冲动。

日本文献中有关竹岛(独岛)的最早记载见于1667年(日本宽文7年)云州藩士斋藤丰山所著《隐州视听合记》。据该书记载:“隐州在北海中,故云隐岐岛。……戊亥间行二日一夜有松岛,又一日程有竹岛。此二岛无人之地。见高丽,如自云(云)州望隐州。故,日本之乾地,以此州为限矣。”<sup>②</sup>《隐州视听合记》中“日本之乾地,以此州为限”的记述表明,至少德川幕府早期日本方面并没有把现在的郁陵岛和竹岛(独岛)视为日本的领土。在上述《权记》中已出现郁陵岛,而在《隐州视听合记》又突然出现“松岛”与“竹岛”,这“松岛”“竹岛”与现在的竹岛(独岛)、郁陵岛又是什么关系呢?据日本学者川上健三的研究,在“近世”<sup>③</sup>日本将现在的“竹岛(独岛)”称之为“松岛”,把郁陵岛称之为“竹岛”或俗称“矾竹岛”,概而言之,“从前在我国(即指日本——引者)称之为竹岛的是今日的郁陵岛,称之为松岛的是今天的竹岛(独岛),这两者的关系在较长时间内有所不同,人们对此也没有过疑心”。<sup>④</sup>郁陵岛与竹岛(独岛)与“竹岛(矾竹岛)”“松岛”之间的关系,“直到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天城’号军舰对郁陵、竹岛(独岛)进行实地调查才得以重新确认”。<sup>⑤</sup>是什么原因日本把“中世”之前业已称之为“芋(迂)陵岛”的岛屿到“近世”把它改称之为“竹岛(矾竹岛)”,把现在的竹岛(独岛)称之为“松岛”至今不得而知,也未见有日韩学者对其进行考证。

19世纪中期以前,日本很多历史文献和地图留下了有关竹岛=矾竹岛(郁陵岛)、松岛(竹岛=独岛)的记载。这些文献资料的记载大致分为三种。其一是,一些文献资料明确把“竹岛(矾竹岛)”和“松岛”记载为韩国的领土。如1785年日本经世家仙台藩士林子平所著《三国

① 川上健三『竹島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古今書院、1996年、70—71頁。

② 川上健三『竹島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古今書院、1996年、50頁。

③ “近世”:日本史的独特划分方法,日本史学界把日本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和现代和战后7个阶段。“近世”相当于16世纪中期“安土、桃山时代”到19世纪中期的“德川幕府末期”。

④ 川上健三『竹島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古今書院、1996年、50頁。

⑤ 大西俊輝『日本海と竹島——日韓領土問題』東洋出版、2003年、33—47頁。

通览图说》附属地图《三国接壤地图》明确标注“松岛”并特别用文字标注为“朝鲜持有(朝鮮ノ持ニ)”并把颜色涂成和朝鲜半岛一样的土黄色。(参见图 9)



附属地图《三国接壤地图》局部



附属地图《三国接壤地图》全部

图 9 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

资料来源:慎镛厦著、韩誠訳『史の解明:独島=竹島』インター出版、1997年、付録二。

据岛根县政府介绍,在绘制于 1790 年(宽政 2 年)的《虾夷草纸全图》和《虾夷风俗人情之沙汰付图全图》中,竹岛被涂成与本州相同的茶色。这 2 张图由幕府虾夷地调查队的成员最上德内绘制。据分析,该图随后被进献给老中松平定信,成为幕府所使用的基础地图。

在地理学家本多利明绘制的《宽政亚细亚地图》(1796 年)和《日本并北方图》、土浦藩地理学家山村才助绘制的《华夷一览图》(1806 年)中,按照当时的名称将竹岛(独岛)标为“松岛”,并涂成日本领土的颜色。当时被称作“竹岛”的韩国郁陵岛也被标为日本领土。<sup>①</sup>

1905 年 2 月,岛根县知事发布第 40 号告示宣布“隐歧岛西北 85 海里处的岛屿称为竹岛,并属于本县”。这是日本政府目前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的主要证据之一。

日本方面对于韩国提供的有关竹岛(独岛)方面不连贯的历史文献资料提出了相当多的异议;同样韩国也指出日本有部分历史文献已经清楚表明竹岛(独岛)并非其固有领土。

### (三)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论争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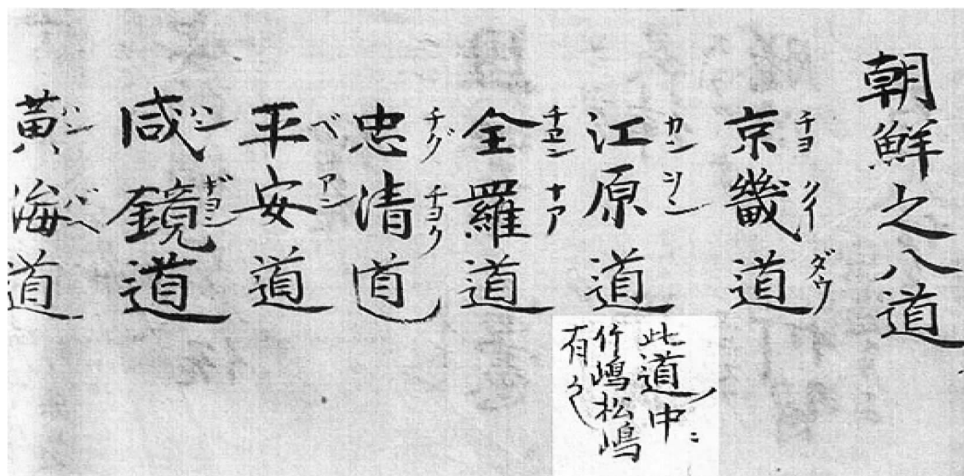
#### 1. 日本“近世”围绕“安龙福事件”的日韩竹岛(独岛)之争

安龙福是影响目前日韩竹岛(独岛)之争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江户时代初期,鸟取藩伯爵国渔民大谷甚吉、村川市兵卫等人经常去郁陵岛附近海域捕鱼,当时他们将郁陵岛称之为“竹岛”或“矾竹岛”,把今天的竹岛(独岛)称之为“松岛”,并于 1624 年获得由德川幕府四位老中永井信浓守、井上主计头、土井大炊头及酒井雅乐头联名签发的《竹岛(即“郁陵岛”)渡海许可状》。<sup>②</sup>直至 1692 年,大谷家后人到竹岛(郁陵岛)海域捕鱼时与朝鲜渔民安龙福等发

<sup>①</sup> 新华国际:“日媒:岛根县发现古代地图将竹岛标为日本领土”2014 年 01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2/c\\_126041579.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2/c_126041579.htm)

<sup>②</sup> 池内敏「17-19 世紀鬱陵島海域の生業と交流」、『歴史学研究』第 756 号、2001 年 11 月、32 頁。

生冲突。此后 1693 年和 1696 年安龙福二次渡日,就郁陵岛(矶竹岛)·独岛(即竹岛 = 松岛)的领有权问题与幕府交涉,此即“安龙福事件”。“安龙福事件”发生后,日本德川幕府与朝鲜李氏王朝进行了长时间的一系列交涉。最终 1696 年,日本德川幕府颁布“竹岛(即“郁陵岛”)渡海禁止令”,<sup>①</sup>禁止日本渔民渡航矶竹岛(郁陵岛),日朝领土争议暂告一段落。“安龙福事件”的关键在于安龙福在李氏朝鲜王朝东莱府所做的供述,安龙福声称得到幕府将军的文书,其内容是“承认竹岛、松岛均是朝鲜的领土”。



安龍福が渡日した時持参した地図に、鬱陵島と独島が朝鮮の江原道に表示されている事実を記録した村川家の文書(1696)

图 10 村川家文书

对“安龙福事件”本身,日本一些学者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宣称:“对于此事实的真实性,我们从根本上抱有的怀疑态度,安龙福的渡日活动是虚构的。”<sup>②</sup> 还有些学者认为,“安龙福事件至 1696 年为止,日本德川幕府禁止日本渔民渡海到郁陵岛,但并不包括竹岛(独岛)在内。日本虽禁止渡海到郁陵岛,但允许国民渡航松岛(即日本现在所称“竹岛”),说明竹岛(指“松岛”)是作为本国领土处理的。”<sup>③</sup> 韩国学者则认为:李朝《肃宗实录》中记载的安龙福供述,已经明示郁陵岛与竹岛(独岛)就是朝鲜的领土。安龙福两次渡日与日本进行交涉过程,也间接证明了竹岛(独岛)是朝鲜王朝的领土。<sup>④</sup> 17 世纪末日朝两国围绕郁陵岛领有权问题的纷争,以德川幕府出台“竹岛(即“郁陵岛”)渡海禁止令形式宣告结束,既然幕府都承认了郁陵岛是朝鲜的领土,作为郁陵岛附属岛屿——独岛,自然也应当是朝鲜的领土。<sup>⑤</sup>

这时期日韩双方主要围绕“安龙福事件”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以前有关“安龙福事件”的

① 金柄烈、内藤正中『竹島/独島:史の検証』岩波書店、2007 年、140-141 頁。

② 川上健三『竹島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古今書院、1996 年、169-171 頁。

③ 大西俊輝『日本海と竹島——日韓領土問題』東洋出版、2003 年、328-330 頁

④ 朴炳涉:《关于安龙福事件的检证》,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2007 年、63-66 页。

⑤ 慎鏞廈著、韓誠訳『史的解明:独島(竹島)』インター出版、1997 年、90 頁。

史料不仅少且仅限于韩国方面的文献,日本却咸有有关“安龙福事件”的相关记载。

2005年在日本的隐歧岛发现了记录有关安龙福渡日活动的《村川家文书》,即日方调查报告《元禄九丙子年朝鲜舟着岸一卷之觉书》等。其中的朝鲜八道文书显示,1696年安龙福去日本时携带的地图中就发现了明确注明“江原道此道中有竹岛(郁陵岛)和松岛(独岛)”文字记录。这一发现不仅使“安龙福事件”虚构说不攻自破,也有力地证明了独岛(竹岛)自古就是韩国的领土。(参见图10,村上助九郎所藏)

## 2.明治初年围绕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的日韩之争

近代日韩竹岛(独岛)纷争主要围绕“竹岛外一岛”的领有权问题展开。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近代国家主权意识的觉醒,日本开始积极“开拓”列岛周边岛屿。1876年,日本人武藤平学向外务省请求“开拓松岛”,外务省官员以松岛归属不明为由拒绝了武藤的请求。1877年日本明治政府内务省为弄清竹岛、松岛的具体方位和相互关系,派遣“天城”号军舰对松岛、竹岛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这次调查结果,日本明治政府内务省致函太政官(相当于“首相”),询问“日本海内竹岛外一岛”编入日本版图之事宜。对此,1877年三月二十日太政官三条实美向内务省发出了如下“太政官指令”。

明治十年三月廿日

关于内务省在附件中询问之日本海内竹岛外一岛编入地籍之事宜,自元禄五年(1692年),朝鲜人入岛以来,就该问题旧政府(指“德川幕府”——引者)与该国(指“朝鲜李氏王朝”——引者)往返交涉之结果,曾有报告称最终与本邦无关,经审核就询问之事项形成如下指令。

指令方案

关于询问之事项,竹岛外一岛可以认为与本邦无关。

原文如下:

明治十年三月廿日

別紙内務省伺日本海内竹島外一島地籍編纂之件右ハ元禄五年朝鮮人入島以来旧政府該国卜往復之末遂二本邦關係無之相聞候段申立候上ハ伺之趣御聞置左之通御指令相成可然哉此段相伺候也

御指令案

伺之趣竹島外一島之義本邦關係無之義卜可相心得事」<sup>①</sup>

《太政类典》第二编还有这样的记载:

“确定日本海中之竹岛外一岛在版图之外”。“矾竹岛又称竹岛,位于隐歧国西北约120里之地,周围约10里,山险峻,平地少,有三条河,又有瀑布。…(郁陵岛的情况)…。另外还有一岛称松岛,周围约30町,与竹岛在同一条路线上,距离隐歧约有80里。树、竹稀

<sup>①</sup> “太政官指令,1877年3月20日に内務省が出した通達”,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所藏。

少,出产鱼和兽……”。

原文如下:

太政類典第二編

「日本海内竹嶋外一嶋ヲ版圖外ト定ム」[磯竹嶋一二竹嶋ト称ス隱岐国ノ乾位一百二十里許ニ在リ周回凡十里許山峻嶮ニシテ平地少シ川三條アリ又瀑布アリ……(鬱陵島の状況)……次一嶋アリ松嶋ト呼フ周回三十町許竹嶋ト同一線路ニアリ隱岐ヲ距ル八十里許樹竹稀ナリ亦魚獸ヲ産ス……]

上述“太政官指令”认为“竹岛外一岛确定与本邦无关”,日韩学者就“竹岛外一岛”具体是否指竹岛(独岛)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以慎镛厦为代表的韩国学者根据 1877 年三月二十日太政官指令及《太政类典》第二编的相关资料认为“竹岛外一岛”所指就是现在的独岛(竹岛),独岛(竹岛)就是朝鲜领土,明治政府的太政官文书再一次确认了这一事实。<sup>①</sup>(参见图 11)此外,韩国学者还指出:日本陆军省 1875 年绘制的《朝鲜地图》和海军省 1876 年绘制的《朝鲜东海岸图》均将独岛(竹岛)包含在朝鲜领土之内。<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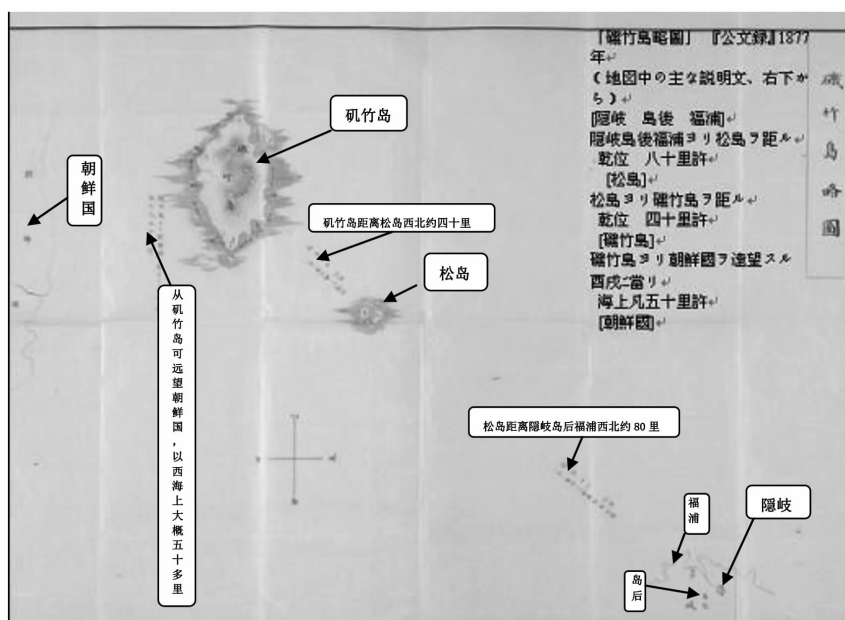


图 11 磯竹島略图

资料来源:「磯竹島略圖」日本内務省「日本海内竹島外一島地籍編纂方針」明治十(1887)年3月17日所収(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所蔵);另见,韩国独岛研究所, <http://japanese.dokdohistory.com/>

① 慎镛厦著、韓誠訳『史的解明:独島(竹島)』インター出版、1997年、108頁。

② 金学俊著、保坂裕二訳『竹島/独島:韓国の論理』論創社、2007年、108頁。

针对韩方的观点,日方认为:1877年太政官调查文件指出“竹岛(即指“郁陵岛”)外一岛确定与本邦无关系”,虽然明治政府没有判定竹岛(即指“郁陵岛”)为日本的领土,但是没有明确指出“竹岛外一岛”具体是指哪个岛屿,即便是指松岛(竹岛=独岛),日本也没有承认其就是朝鲜的领土。<sup>①</sup>日方的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纯属狡辩。1877年的太正官调查文件——《公文录》“矾竹岛略图”(参见图11)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不仅准确无误地掌握了矾竹岛(郁陵岛)、松岛(竹岛=独岛)的地理位置,而且已弄清了“朝鲜国”与郁陵岛(矾竹岛)、竹岛=独岛(松岛)之间的关系。该地图中除了“矾竹岛(郁陵岛)”和“松岛(竹岛=独岛)”之外再无其他争议岛屿,既然如此“竹岛外一岛”就别无其他,指的就是“松岛(竹岛=独岛)”,“竹岛(郁陵岛)外一岛”与日本无关,那么,周边没有其他国家的条件下,这个“竹岛外一岛”自然是“朝鲜国”的领土了。

### 3.1905年“岛根县告示”与日韩竹岛(独岛)之争

1903年日本隐歧企业家中井养三郎移住竹岛(独岛),中井为谋求独占该岛渔业资源向政府请愿将其编入日本领土。以此为契机,日本明治政府于1905年1月28日以竹岛(独岛)归属不明、并以保护本国渔业资源为由将其编入日本领土,并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将竹岛(独岛)归岛根县管辖,<sup>②</sup>同年2月22日,岛根县发布《告示第40号》宣布竹岛(独岛)为岛根所属。

韩国政府多次强调独岛(竹岛)自古以来就是韩国的固有领土,独岛(竹岛)是日本近代侵略韩国过程中强占的第一片韩国领土,并不是“无主地”。韩国学者指出:《岛根县志》中的记载说明中井在请愿之前已经知道独岛(竹岛)与郁陵岛都是朝鲜的领土,为改变这一状况才向政府请愿将该岛纳入本国领土。<sup>③</sup>而日本在领土编入过程中没有同韩国政府进行任何事先协议、事后照会,其原因是害怕引起国际社会的批判及日本侵略朝鲜的行径引起朝鲜政府的警觉。<sup>④</sup>日本方面则认为:日本虽以“无主先占”形式将竹岛(独岛)纳入其领土,但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竹岛(独岛)不是日本的领土。日本17世纪就发现了竹岛(独岛)并行使主权经营该岛,因此日本政府通过“岛根县告示”将竹岛(独岛)纳入其领土之行为是对拥有竹岛(独岛)主权的再次声明。<sup>⑤</sup>而且“岛根县告示”发布后,先后刊登在当地新闻媒体上,并不是秘密进行的侵略性行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拥有对竹岛(独岛)的领有权,发布“岛根县告示”并没有马上向韩国通报的义务。<sup>⑥</sup>笔者认为,竹岛(独岛)是否为“无主地”,本身日韩两国之间就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日本以“无主地”为由对竹岛(独岛)主张领土主权是不恰当的,而且日本将竹岛(独岛)编入其领土之后,马上在岛上建立军事眺望楼借以监视俄国舰队,这让人怀疑其发布“岛根县告示”的真正目的。

① 大西俊輝『日本海と竹島—日韓領土問題』東洋出版、2003年、5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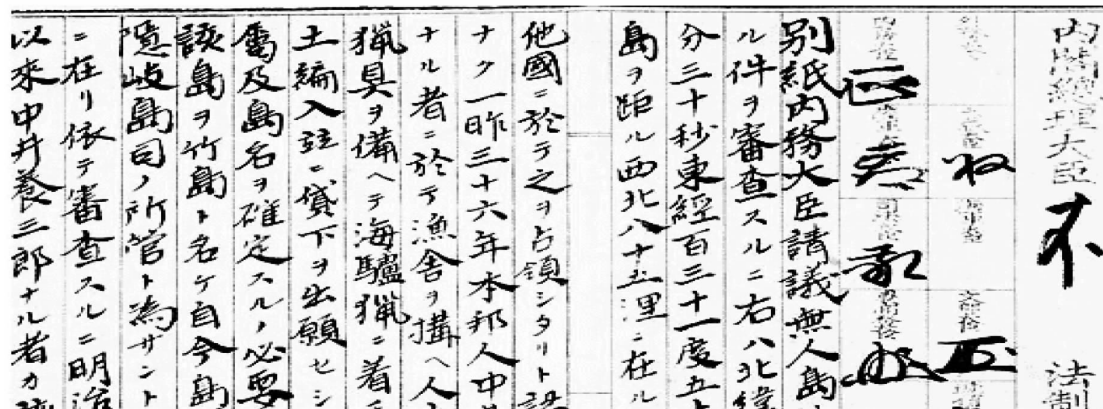
② 内藤正中 『竹島(鬱陵島)をめぐる日朝関係史』多賀出版、2000年、165頁。

③ 金柄烈、内藤正中 『竹島/独島:史の検証』岩波書店、2007年、84-85頁。

④ 慎輔厦:《独岛领有权资料的探究》第二卷,独岛研究保全协会,1999年,第286页。

⑤ 皆川光:「竹島紛争と国際判例」、『前原光雄教授還暦記念、国際法諸問題』慶応通信、1963年、366頁。

⑥ 芹田健太郎『日本の領土』中公叢書、2002年、153-157頁。



日本政府の閣議における独島編入決定文(1905)

图 12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竹岛(独岛)编入日本版图的文件(1905年1月28日)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竹岛(独岛)编入日本的决议文书(日本公文书馆藏)

#### 4.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相关内容与竹岛(独岛)归属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分别占领韩国和日本时,为有效控制日本,盟军总司令部于1946年相继发布了 SCAPIN 677 令及 SCAPIN 1033 令。两条指令中已做出将竹岛(独岛)从日本领土分离的决定,并不允许日本人与竹岛(独岛)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但是,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由美国等48个战胜国和与战败国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中并没有对竹岛(独岛)的归属做出明确规定。《对日和平条约》第二条规定:“日本承认朝鲜(韩国)之独立,并放弃对朝鲜(韩国),包括济州岛、巨文岛及郁陵岛在内的一切权利、权力根据与要求。”<sup>①</sup>

本方面强调认为:“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在起草过程中,日本曾抗议美国将竹岛(独岛)纳入韩国领土,因此美国在第六次草案中将竹岛(独岛)解释为日本领土。”《对日和平条约》签字的前50天,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虽多次提出修正要求,但美国以“竹岛(独岛)1905年起已属日本岛根县管辖,现在并不是韩国的领土”为由拒绝了韩国大使的抗议。对此日本认为,由于《对日和平条约》并没有提及把竹岛(独岛)从日本领土分离出去,因而这事实上等于是对竹岛(独岛)属于日本领土的再确认。<sup>②</sup>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二条中,日本只是放弃对济州岛、巨文岛与郁陵岛的权利,其中并不包括竹岛(独岛)。<sup>③</sup>韩国方面则认为: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第二条,只把韩国的代表性岛屿标明在其中,这并不意味着韩国领土范围只限于济州岛、巨文岛及郁陵岛。<sup>④</sup>而事实上,日本与韩国都有数千个岛屿,要将全部岛屿

① 金学俊著、保坂裕二訳『竹島/独島:韓国の論理』論創社、2007年、186頁,另见,“对日和约”,《国际条约及(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335页。

② 塚本孝「サンフランシスコ条約と竹島」、『レファレンス』第389卷、1983年第6号、51—63頁。

③ 植田捷雄:「竹島の帰属をめぐる日韓紛争」、『一橋論叢』第54卷、第1号、1965年7月、24頁。

④ 金炳烈『独島か竹島か』タグメディア、1997年、214—215頁。

名称标明在条约中这是不太现实的。而对于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六次草案中,韩国驻美大使提出的修正要求被美国拒绝的原因,韩国学界并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笔者认为这与美国在东亚谋求的政治利益有关。由于东西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在东亚遏制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扩张的需求,准备在该地区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反共堡垒,而美国一直寄予厚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凸显。东亚国际形势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对日政策,把美国原来“限制和削弱日本”的对日政策转变为“扶植与复兴”日本这一“远东工厂”的政策。在这种情势下,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六次草案中,美国最终改变了原先将“竹岛(独岛)从日本领土分离”出去的打算,致使《对日和平条约》中也未能明确竹岛(独岛)的最终归属问题。竹岛(独岛)的归属问题最后还是留给日本与韩国自己解决。

综上所述,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中虽然没有对竹岛(独岛)归属做出明确规定,但也不能就此认为竹岛(独岛)就是日本的领土。事实上美国在竹岛(独岛)的归属问题上采取了模棱两可或者中立的态度。

## 二、从国际法角度透视日韩竹岛(独岛)争端

日韩两国都主张“竹岛(独岛)是本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双方不仅试图从历史文献中印证各自的主张,还试图援引国际法上的“先占”“有效统治”等原则来支持自己的领土主权要求。

### (一)从国际法的先占原则看当前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

“先占”是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合法方式之一,即通过占领“无主地”取得该土地的主权。它需要具备下述条件:(1)先占的主体必须是国家且有获取该土地为其领土的意思表示。(2)先占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它可以是从来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也可以是被某个国家抛弃的土地。(3)必须实施有效的占有,即通过行政、立法、司法活动对该地实行占领或控制,但对于无人居住的岛礁则仅宣示主权即可。<sup>①</sup>

日韩两国各自都宣称竹岛(独岛)是本国固有领土,自己对其实施了先占行为。日本官方及学界把1905年竹岛(独岛)编入岛根县的历史记载作为“先占”的直接证据。其依据是:把“竹岛(独岛)”编入岛根县的举动是日本国家行为,且“没有发现有足够证据来证明这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处于他国占领之下”,因而“添加于日本领土之上”。但是1905年日本对竹岛(独岛)宣示主权之后未能一直有效对其行使主权到今日。二战后,盟国在处理战败国日本领土的过程中竹岛(独岛)曾一度被排除在日本领土之外。另外,自1953起独岛(竹岛)就一直处于韩国的实际控制之下。根据先占原则的第三个条件,国家对没有争议的无主土地宣示主

<sup>①</sup> 太寿堂鼎「国際法上の先占について—その歴史的研究」、『法学論叢』第61卷、第2号、1955年6月、36-99頁。



权,并以适当方式行使其主权,即通过行政或司法管辖行为对其实行有效占领和统治。只有有效占领才能产生领土主权。而所谓“有效占领”应当是“持续、平稳的行使国家权力”。<sup>①</sup>日本只是发表告示对竹岛(独岛)宣示了主权而已,并没有对竹岛(独岛)持续、平稳、有效地行使领土主权。

“先占”的前提首先是无主地。无主地,是指不在任何主权国家占有和控制之下的土地,对无主地任何先发现的国家均可主张获取领土主权。<sup>②</sup>日本与韩国的竹岛(独岛)争端中,历史文献中有关竹岛(独岛)的记载均成为双方为其主张领有权的依据,同时这些又是决定竹岛(独岛)是否是无主地的关键。韩国学者认为,早在三国时代韩国就有关于独岛的历史文献记载,他们还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新增东国輿地胜览》等众多历史文献中引证史料,论证独岛(竹岛)自古就是韩国的领土。日本学者也认为竹岛(独岛)自古就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天城”号军舰对竹岛(独岛)进行实地勘察以后,就更加明确意识到竹岛(独岛)就是日本的领土,于是在1905年通过内阁会议决议重申了对竹岛(独岛)的主权。从古代的朝鲜(韩国)的历史典籍来看,独岛(竹岛)的名称有:于山岛、三峯岛、可支岛、石岛等,但是要论证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称谓的岛屿都是指独岛(竹岛),尚缺乏足够的证据链条。日本学者据此不断提出质疑,并认为这些名称是否均为竹岛(独岛)有必要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更加缜密的分析。但是目前韩国方面发掘出的史料证据还依然并不充分。如川上健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通过分析《朝鲜王朝实录》《新增东国輿地胜览》等历史文献记载认为:于山岛其实就是郁陵岛,其还有羽陵、芋陵、蔚陵等称呼,但并不是现在的竹岛(独岛)。<sup>③</sup>1900年10月25日,大韩帝国发布敕令第41号中,把郁陵岛改称郁岛,把岛监



图 13 1900 年 10 月 25 日的大韩帝国敕令

资料来源:慎镛厦:《独岛:让世界了解独岛问题的 16 个要点》,独岛协会,2009 年,28

① 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 125 页。

② [英] 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余敏友译:《国际公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48 页。

③ 川上健三『竹島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古今書院、1996 年、99 頁。

改称郡守,该敕令第2条规定郡厅位置定于台霞洞,管辖郁陵全岛和竹岛,石岛的事务。<sup>①</sup>(参见图13)其中有关石岛的解释成为日韩争论的焦点。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大韩帝国1900年的敕令并不是对于山岛或竹岛(独岛)领有宣言,因为韩国文献中并没有有关石岛的记载,不能证明石岛就是现在的竹岛(独岛)。日方认为石岛是一个指代不明的岛屿。虽然近些年韩国政府及学界依据日韩史料对“于山岛=独岛=松岛=石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并得出了肯定大韩帝国敕令中的石岛即为现今的独岛(竹岛)的结论,从而再次证明了独岛(竹岛)为韩国的领土。然而,韩方的上述论证依然未能消除双方在该问题上的分歧。

历史上竹岛(独岛)的名称的混乱状况使日韩对17至19世纪有关该岛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分析和理解大相径庭。这种情形为确定该岛的主权归属增加了难度。因此,从先占无主地的国际法原则看,双方都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撑己方的观点。虽然日本对韩国有关独岛(竹岛)是自己领土的论证不断提出异议,但至今也未能够拿出有力的相关史料证明竹岛(独岛)就是日本固有领土。从国际法“先占原则”分析,日本对竹岛(独岛)的领有权的主张仍总体上缺乏足够充分的证据。另外,历史上日韩有关竹岛(独岛)争议的记载本身也很好地说明,竹岛(独岛)并不是近代国际法上所讲的“无主地”。

## (二)从国际条约及有效统治原则看当前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

有效统治原则是指政府必须能在其控制下的领土上有效地行使权力,只有这样各国才能承认其对该领土的主权。二战后,韩国学界主要依据盟军总司令部指令及有效统治原则论证独岛(竹岛)是韩国领土,而日本则试图以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为依据明确日本对竹岛(独岛)的领有权。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剥夺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sup>②</sup>1945年8月14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又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sup>③</sup>《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规定,二战结束后,日本必须归还其侵占的领土。日本在二战末期无条件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据此1946年1月29日,日本占领当局盟军总司令部(SCAP/GHQ)发表了有关从政治和行政上分离日本若干周边区域的决定书“SCAPIN第677号令”(SCAPIN-677)。该指令第三条明确规定:“为确保指令的目的,日本被限制于其主要四岛及周边约1000个相邻岛屿,其中包括对马岛和北纬30°以北的琉球群岛、南西诸岛。排除在外的岛屿有:郁陵岛、利尔库扬岩(即“竹岛(独岛)”——引者)、济州岛、北纬30°以南的琉球群岛、伊豆、南方、小笠原群岛、硫磺群岛和包

<sup>①</sup> 慎鏞厦著、韓誠訳『史的解明:独島(竹島)』インター出版、1997年、133-135頁。

<sup>②</sup> 《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35页。

<sup>③</sup>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78页。

括大东诸岛、冲之鸟岛、南鸟岛的其他外部太平洋诸岛。其中太平洋诸岛指：千岛列岛、齿舞群岛(包括小晶、勇留、秋勇留、志癸岛、多乐岛等)、色丹岛等。<sup>①</sup>1946年1月29日,盟军总司令部依据“SCAPIN第677号令”的规定,把利扬库尔岩(竹岛=独岛)移交给驻韩美军管辖,并于同年6月22日,盟军总司令部又发布了关于指定日本渔业及捕鲸业操作区域备忘录“SCAPIN第1033号令”(SCAPIN-1033),其中第3项中又进一步规定:“今后日本的船舶及船员不得接近竹岛=独岛(北纬37°15′,东经131°53′)12海里以内区域并且不得以任何形式与该岛接触。”<sup>②</sup>韩方认为上述指令中的相关规定就是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韩国的一种明示,但是日本政府及学界认为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是对日本进行行政占领的指令,而不具有对日本领土处分的权限。<sup>③</sup>即SCAPIN第677号令并不是依据《波茨坦公告》第八项规定对日本诸小岛的归属问题做出的最终决定,SCAPIN第1033号令也不是决定日本国境线及渔业分界线的最终文件。而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中并没有有关竹岛(独岛)归属的明确规定,因此,不能依据盟军总司令部指令认为竹岛(独岛)就是韩国的领土。

如上所述,虽然日本对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进行了辩解,但也无法依据国际条约证明竹岛(独岛)就是日本领土,相对而言国际条约和盟军总司令部指令对韩国的独岛(竹岛)领有权主张是非常有力的支持,且韩国对独岛(竹岛)的有效统治使其在争端中处于优势地位。1905年日本将竹岛(独岛)编入岛根县,并宣示了对竹岛(独岛)的主权。岛根县知事也于1905年2月22日发布第40号告示,宣布“隐岐岛西北85海里处有岛屿称为竹岛,隶属于本县”。<sup>④</sup>而且1953年趁朝鲜战争方酣之际,本还曾派兵一度占领过竹岛(独岛),并在岛上建立过领土标志碑,但是同年又被洪淳七组织领导的韩国义勇队赶走。赶走日本占领者之后,洪淳七等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自此韩国一直实际控制着独岛(竹岛)。从此之后,韩国一直在独岛(竹岛)驻扎警备队,并陆续设置灯台、发行独岛邮票、实地测量绘制独岛(竹岛)地图、进行对独岛(竹岛)植被学术调查、建设码头等等,对独岛(竹岛)实施了有效管理。

虽然日韩双方都以历史文献、国际法等为依据在竹岛(独岛)主权问题上各执一词,但是韩国对独岛(竹岛)进行的有效控制的现状,使韩国在日韩独岛(竹岛)争端中实际处于优势地位。

### (三)从国际法上的“时效原则”看当前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

再从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时效原则”来看,当前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传统的国际法将“时效原则”作为取得领土的一种方式,只要领土占有国能够“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的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

① 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日本占領及び管理重要文書集・第2巻・政治、軍事、文化篇』、1949年、24頁。

② 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日本占領及び管理重要文書集・第4巻・經濟篇(II)』、1949年、142頁。

③ 高野雄一『日本の領土』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19-20頁。

④ 大西俊輝『日本海と竹島——日韓領土問題』東洋出版、2003年、71-73頁。

认为该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sup>①</sup>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还继续不断地提出抗议和主张,就被认为占有国对所占领土的实际主权行使受到了干扰。

独岛(竹岛),目前由韩国实际控制。日本政府曾在 1954 年 9 月 25 日向韩国政府建议将两国竹岛(独岛)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并表示愿意遵守国际法院的任何裁决内容,但是韩国政府并没有接受日方建议。同年 10 月 28 日,韩国政府以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为理由正式拒绝了日方的该项建议。

韩国政府及多数韩国学者认为,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国际法上看,独岛(竹岛)都分明是韩国的领土。在韩方看来,根据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上确立领土主权的核心要件,即“先占原则”和“实行有效统治原则”,韩国拥有对独岛(竹岛)的主权是确定无疑和不容争辩的事实。1952 年 1 月 18 日,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发表海洋主权宣言,单方面在朝鲜半岛周边公海上设置“和平线”(日方称之为“李承晚线”),并宣称在“和平线”以内韩国拥有海洋主权,独岛(竹岛)也被划入其海洋主权线范围之内。二战后时至今日,韩国已实际控制和占领独岛(竹岛)近 70 年,如果日本政府对此不表示抗议或提出外交备忘录,按国际法的“时效原则”,独岛(竹岛)有可能将永远归属韩国。但在竹岛(独岛)问题上,日本数十年来不断地通过外交途径向韩国发出备忘录、抗议照会等,还曾多次提议把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交由国际法院裁决,甚至采取实质行动派军舰进行示威,借以表明对该岛的主权诉求。从上述事实来看,韩国对独岛(竹岛)的占领也并不满足“不受干扰”状态下“持续有效地占领和进行管理”的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原则。日本政府针对竹岛(独岛)问题的持续不断地提出外交照会、抗议和示威是对韩国独岛(竹岛)领有权主张的最大障碍。更何况,国际法学界对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时效原则”能否单独成为一国取得领土的方式尚存争议。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在涉及领土归属问题的国际司法裁决中主要依据“时效原则”取得领土的先例。

尽管如此,从上述事实中不难发现,在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争执问题上,无论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还是从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原则上看,韩国在竹岛(独岛)领有权争端中还是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 三、从国家政治经济角度看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各国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权益不断向海洋方向拓展,岛屿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竹岛(独岛)本来是人迹罕至的小岛,近年来日韩两国围绕竹岛(独岛)归属权问题频频发生争执,各不相让。这背后潜藏着日韩两国巨大的国家利益冲突。

---

<sup>①</sup> [英] 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译:《奥本海国际法》(第 1 卷、第 2 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第 88 页。

### (一)日韩竹岛(独岛)之争背后的两国经济利益冲突

竹岛(独岛)处于日本海中寒流和暖流交汇之处,其周边海域是大片丰饶的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其海底还蕴藏着较丰富的油气田。竹岛(独岛)主权的归属涉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划分和周边海洋油气田勘探开采问题。

1982年12月10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后正式开放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沿岸各国的海洋权益做出了新的规定。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该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可以设立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可设置加领海在内的不超过24海里的毗连区域,可设置加领海和毗连区域在内的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200海里之外大陆架上的权利。很显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竹岛(独岛)主权的归属问题,已直接关系到日韩两国海洋权益的划分,涉及到了日韩两国各自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的大小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之后,韩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整国内与海洋相关的法律。1995年12月6日韩国政府修订1977年制定的《领海法》颁布了《领海及毗连法》,并将原来管理上比较分散的13个中央政府部门的涉海部门合并成立了海洋水产部。1996年2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全面设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方针。针对日本宣布设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决定,韩国政府于1996年2月7日宣布,将在独岛(竹岛)修建一座能够停靠500吨级船舶的码头,以便更好地解决驻扎在岛上的3名警官和23名警员的轮换及食品供应。进而1996年8月8日韩国政府也制定《专属经济区法》(又直译为《排他经济水域法》),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竹岛(独岛)再一次成为日韩两国争夺的焦点。1998年1月,日本单方面宣布废止到期的《日韩渔业协定》,意图迫使韩国重新谈判缔结新的渔业协定。在日韩“新渔业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日本迫使韩国将独岛(竹岛)划出韩国专属水域之外、另行设立日韩共管水域,使竹岛(独岛)进入日韩共管水域之内。<sup>①</sup>1998年11月28日,日韩签订了《新日韩渔业协定》,该协定于1999年1月22日正式生效。《新日韩渔业协定》将竹岛(独岛)及其周边水域划为“中间水域”,由韩日渔业共同委员会管理。<sup>②</sup>《新日韩渔业协定》中“中间水域”的划分不仅使日后日韩两国对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的争端更加纠缠不清,也使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演变成为一场更大的海洋权益之争。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韩两国出版的地图和地名录可以看出,双方在竹岛(独岛)主权问题上毫无妥协之意。1993年韩国中央地图社出版的《韩国道路地图集》和从1991年至2002年韩国公报馆出版的《韩国简介》都在插图上突出标出独岛(竹岛)为韩国的领土。自1999年开始,韩国又开辟了去独岛(竹岛)的旅游路线。而1997年日本政府官方出版的《日本地名录》也收录竹岛(独岛)为日本版图,这也表明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竹岛(独岛)主权要求。<sup>③</sup>

① 许金彦:《日韩“独岛争议”研究》,《亚太研究通讯》,2009年第7期,第162页。

② 金学俊著、保坂裕二訳『竹島/独島:韓国の論理』論創社、2007年、223頁。

③ 周定国:《韩日独岛(竹岛)归属之争》,《地图》,2003年第3期,第22-23页。

竹岛(独岛)的归属问题,不单单是岛屿本身归属问题,而是一大片海洋权益的归属问题,事关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 (二)日韩竹岛(独岛)之争背后的两国政治利益冲突

领土归属问题,除涉及经济经济利益之外,还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国民情感等政治因素,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韩竹岛(独岛)之争自然也不例外。在以民族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政治领域,领土主权归属的议题,往往能够起到凝聚民心 and 巩固统治者政治地位作用。尤其是统治者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最容易收获民心,巩固其政治地位。

1995年10月,在野多年的日本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大选中发表了“重掌政权以后处理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的政治公约”,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和积极作为态度。<sup>①</sup>日本自民党的这一立场和态度助力自民党赢得了此次选举,实现重返执政舞台的政治目标。但是,也使自日韩邦交正常化以来沉寂多年的两国竹岛(独岛)争端再起。2002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载有“日本对竹岛(独岛)拥有主权”等内容的《最新日本史》教科书。2005年,正值日韩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日本岛根县议会不顾韩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强行通过了设定每年2月22日为“竹岛日”的法案。2008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在准备从2012年度开始采用的新的中学社会课《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一书中,写进了有关竹岛(独岛)是日本领土的内容。2009年日本防卫省发表的2009年度版《防卫白皮书》中也再次标明“竹岛为日本领土”,2010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将竹岛(独岛)的主权要求又写进小学教科书。

对于日本接连不断地在竹岛(独岛)问题上大做文章,韩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2003年2月,卢武铉就任韩国总统以后,起初在朝鲜发展核武器、驻韩美军等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招致国民失望与反感,民意支持率一度下滑至20%。为了挽回民众的支持率,卢武铉主打日牌,在独岛(竹岛)问题上表现出决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和态度,重新成功挽回了国内民众支持,使民众支持率回升到40%。<sup>②</sup>2005年2月22日,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设立“竹岛日”法案以后,韩国总统卢武铉发表《关于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谴责日本的行为,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时期将独岛纳入自己的领土,这是用武力将独岛强行掠夺的行为。日本岛根县宣布为‘竹岛日’的2月22日正是100年前日本强行将独岛纳入自己领土的日子。这是将过去的侵略战争正当化,否认大韩民国光复的行为。”<sup>③</sup>2005年6月,韩国庆尚北道议会通过了“独岛月”条例,规定每年10月为“独岛月”。2005年韩国政府和国民议会制定了《可持续利用独岛法案》,据此,2006年韩国政府制定了可持续利用独岛(竹岛)的国家综合计划。200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初中历史教科书指导手册中写进了阐明“竹岛(独岛)”是日本领土的内容。此时,韩国李明博政府正因从“疯牛病”疫区美国进口牛肉问题,遭受韩国民众前所

① 许金彦:《日韩“独岛争议”研究》,《亚太研究通讯》2009年第7期,第158页。

② 松室猛:『日韓歴史経過と領土問題』,http://www.wombat.zaq.ne.jp/matsumuro/18-11.htm.

③ “韩总统卢武铉就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全文)”,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3-24/26/554757.shtml.

未有的反对和抗议。进口美国牛肉风波使李明博政府的民众支持率仅剩下了两成,多项重大经济改革计划都受到拖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李明博政府转而在独岛(竹岛)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sup>①</sup>

竹岛(独岛)问题既是外交问题,更是日韩两国国内棘手的政治问题。到目前为止,日韩两国历届政府为了迎合国内民意、捞取政治资本,在有关竹岛(独岛)问题上都一贯采取强硬立场,以至于双方在该问题上难以达成妥协、形成共识。对日本来说,随着其国内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渐渐抬头,在对外交往中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日益明显,在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尤为明显。

日本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具有明显的连带性。日本在竹岛(独岛)问题上的态度和应对势必对中日“钓鱼岛”问题和日俄“北方领土”问题的处理产生影响。而后两者的应对难度比“竹岛(独岛)”问题更为复杂和艰难。日本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的任何松动都会引发其他领土主权问题上的连锁反应。因此,日本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断难轻易做出让步。

对韩国而言,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日韩两国国民在民族情感上的积怨很深。韩国人认为,历史上日本侵略和殖民朝鲜半岛,使韩国人民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二战后日本拒不反省侵略、殖民东亚各国的历史,拒不正式道歉的态度,使很多韩国民众原本就憋着一股闷气,而近些年日本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架势则把韩国人愤闷推到了爆发临界点。对于韩国人来说,独岛(竹岛)领有权问题不仅仅是争夺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问题,它对于揭露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历史真相和维护民族尊严方面也有重大意义。因此,对韩国而言,独岛(竹岛)领有权论争的背后蕴含着韩国国民要彻底光复国土、为民族一雪前耻的情感因素。因为,独岛(竹岛)对韩国人而言既是“日本侵略的最初牺牲地”,也是“战后民族独立的象征”,所以一谈到韩日领土纠纷,许多韩国人马上就联想到 100 余年前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随后的殖民统治,其情绪都非常激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为了安抚民族感情,韩国政府也必须不时地对日表现出强硬立场,否则就会失去民心。<sup>②</sup>

综上所述,由于日韩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争执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两国国内复杂的政治因素,使日韩双方都很难轻易改变其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 四、结语:竹岛(独岛)问题发展趋势

二战后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大多是在争议双方关系良好之时,运用国际法公正合理地加以解决的。目前日韩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领域的交流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sup>①</sup> The Korea Herald and Park Hyun-jin: *(Insight into Korea series, v.8), Insight into Dokdo: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Korea's Sovereignty*, The Korea Herald-Jimoondang, 2009, p178.

度,但两国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的争执依旧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毕竟,竹岛(独岛)问题承载着双方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国内复杂的各种政治因素,双方可回旋的余地很小。但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要想解决日韩在竹岛(独岛)问题上的分歧和争执,双方必须做出“某种妥协”,在相互照顾对方利益的基础上,协商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正基于这样的思路,1998年11月28日,韩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新韩日渔业协定》。这个协定将竹岛(独岛)及其周边水域划为“中间水域”,在“中间水域”由日韩渔业共同委员会来管理。<sup>①</sup>这说明日韩双方在竹岛(独岛)领有权问题上并不是一点解决办法都没有。如果日韩双方均抱着相互谅解、互惠互利的态度和原则去管控分歧,寻找各自的利益契合点,问题终将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

从目前看来,竹岛(独岛)问题的解决,也只能通过互相协商的方法谋求解决。通过协商,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现互利互惠,可能是未来解决日韩独岛争端的最佳选择。反之,如果任何一方一意孤行,都势必造成事态的恶化,会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显然是与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相悖的。

---

<sup>①</sup> 金学俊著、保坂裕二訳『竹島/独島:韓国の論理』論創社、2007年、223頁。



# 日本近世文学结社活动作用下 汉诗风雅的大众化

——以江湖诗社为例

李雯雯 严 明

**内容提要** 日本汉文学发展至江户时期,海内文章落布衣。人文素养累积深厚,日本地域性的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诗社的大量涌现表明诗人的社团和宗派意识的增强,诗社集成、宗派诗作或按某种意图编纂的诗歌总集亦随之大量出版,加之以诗话为中心的诗学专著高产量出现等文化因素作用之下,诗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事盛况。本文以江户时期江湖诗社为例,探讨近世日本诗坛在标榜诗风、奖掖后进的社集活动影响下汉诗风雅的大众化。力求剖析隐藏在汉诗创作活动中的时代信息及结社意图,发掘在日本近世汉诗结社文学活动过程中,文体环境与日本社会历史进程中社会思潮的关系。

**关键词** 江户时期 江湖诗社 奖掖后进 诗风诗论

**作者简介:** 李雯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学博士。

严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诗史》(批准号:19ZDA295)的研究成果。

## 一、引言

文人结社作为中国古代典型的社会文化组织形式,是文人们以文会友的主要活动方式。日本江户时期的诗社数量蔚为壮观,<sup>①</sup> 文坛社集频出,<sup>②</sup> 社事种类繁多、社员数量众多、作品质量较高且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极大。日本汉文学萌芽于中国文学这一枝干,并不断从中国文

① 江户时期掀起了缔结诗社的高潮,较为出名的如江村北海的赐杖堂、服部苏门的长啸社、片山北海的混沌社、安达清河的市隐堂、龙草庐的幽兰社、田中鸣门等的营谷甘谷诗社、柴野栗山等的三白社、市河宽斋的江湖诗社、柏木如亭与大窪诗佛共设的二瘦诗社、僧云室等的小不朽社、山田鼎石的凤鸣吟社、柏木如亭的晚晴诗社、佐羽淡斋的翠屏吟社、高阶肠谷的芙蓉吟社、山本北山等的竹堤吟社、广濑淡窗等开设的关西社、藤森弘庵的清风吟社、梁川星岩的玉池吟社、广濑旭庄的风月社、菊池海庄的古碧吟社、久家畅斋的玉兰社、梁川星岩和江马细香等的白鸥社、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等。

② 萱园派社有《萱园录稿》、幽兰诗社有《金兰诗集》和《丽泽诗集》、市隐堂有《向风草》、江湖诗社有《今四家绝句》、玉吟诗社有《玉吟诗社集》、广濑淡窗有《宜园百家诗》、木下顺庵一门的有《木门十四家诗集》和《钟秀集》、下谷吟社有《下谷吟社诗》、古碧吟社有《古碧吟社小稿》、七曲吟有《七曲吟社诗》等。

学中汲取营养。明清时期,书籍传播便利,文献种类繁多,日本文人因此可以及时并高效了解中国文坛的发展动向,在不断调整国内汉文学态势的基础上,为本土汉文学结社提供了发生条件与发展土壤,极大提高了汉文学发展速度。

天明八年(1788),汉诗人市河宽斋创江湖诗社,地点位于在日本江户玉池。“昌平辞职之后,除伏东郊之外,君子交绝,生徒日谢。于是得大展力于所好。与一二从游之士,盟结吟社,日以为娱乐。社名江湖,取之宋人之流派”,<sup>①</sup>社名取自南宋的江湖诗派,其诗风也由拟唐拟明诗转变为清新性灵的宗宋之诗。“宽斋先生尝论诗云:‘诗本风情,不求之风趣而求之格调,抑远矣哉!且格犹人品,品分上下,士农工商,各有身分,有品格,臣而为君,农而为士,谓之不知分。故应制试帖,吾所不为,何则?身在江湖也;从军塞下,吾所不作,何则?时际升平也。夫教自修身始,而充之天下,学诗亦尔。言其身分之中,无所不能,然后应制、从军从所遇而皆不出于吾身分之外,故学诗一求之目前,不必求之远’”。<sup>②</sup>江湖诗社在立社之初就将其文学主张放在了首位,倡导宋诗性灵诗说,反对明代一味模拟唐诗之弊,这是诗教繁荣的表现,也是江户文人结社兴盛的佐证。结社不仅仅只是文人们之间的雅集互动,也成为了江户时代汉文学发展的重要渠道。

## 二、诗学主张和文化倾向

日本与中国一样,也有唐宋诗之争。“诗虽嫌陈腐,亦无妄自捏造字面之理。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古人郑重乃如此。后生妄以己意,种种制作,所谓愚而好自用者。偶有人问来处,亦自知其非,乃诡曰出某集。吾谁欺,欺天乎?且所谓思极令斩新之谓,其胜人处不必在用生字也,犹之善治庖人其料不过寻常鱼肉,一经调剂便作珍羞殊品。今之诗流,烹蛇享客者多矣。”<sup>③</sup>市河宽斋创立江湖诗社之初即表明该社诗学立场,强调诗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世之称唐明者,取材有限,规模已定,譬如栋梁桷椽毕备,然后营宫室,虽拙工,结构原自不难。至宋元则不然,譬如造凌云之台,架空构虚,出人意表,精巧自非输般,安能得措手?宜矣伪唐诗之多,而真宋诗之少也”。<sup>④</sup>针对时弊,市河宽斋与山本北山一扫前风,在诗社中聚集了一批专业诗人,可谓才俊集结,除市河宽斋、大窪诗佛、<sup>⑤</sup>柏木如亭、菊池五山“江湖四才子”

① 《东阳诗抄》卷五,载津阪孝绰《赠河子静》诗注“子静为昌平学都讲,仕富山侯之儒官。致仕后优游于诗酒之间。为江湖社之盟主。”

② 市河宽斋(1749—1820),名士宁,字子静,通称小左卫门,号宽斋、西野、西鄙人、半江、江湖诗老、玄味居士等。大窪诗佛:大窪诗佛「詩聖堂詩話」、池田四郎次郎编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年、431頁。

③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頁。

④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頁。

⑤ 大窪诗佛(1767—1837),名行,字天民,通称柳太郎,号诗佛、瘦梅、诗圣堂、江山翁等。

外,还有山本北山、葛饰蠹庵、冈澹斋、田中鸣门、筱崎三岛、梁川星岩等大家,<sup>①</sup>重要文学家参与到社团中来,其诗文观被社中其他成员推崇、跟和,大窪诗佛《诗圣堂诗话》云:“余初作诗,独立无依,复因高蒙士,得入宽斋先生江湖诗社,与舒亭、梅外、斋、娱庵、伯美诸人交”,<sup>②</sup>主盟人物的影响与群体效应极大促进了社团的发展。

诗社前期创作采用分诗题形式,“屡分诗题以课同社,一时咏十梅。蟻斋《未开梅》云:‘香玉枝头未圻时,蓬蒿丛里自仙姿。多情杜牧吾相似,等候湖州十岁期。’诗佛《梅实》云:‘叶间的畅满枝垂,无复当时冰雪姿。一段酸心谁会得?多情小杜重来时’”。<sup>③</sup>两人同用一典,而调度各有宜,此诗境之所以为妙也。在宽政十年(1792)的集会上,“戊午四月,蟻斋借某家小梅别墅,招邀同社,一时游者为宽斋先生父子、梅外及余等数人,各有题诗。”社人频频作诗,各献其才。市河宽斋诗云“林池碧浸暮天澄,影暗栏干有客凭。拢岸小舟知底事,黄昏欲点水心灯。”与社人员有森冈松荫、森冈足庵名、森冈柯亭、<sup>④</sup>海蟻斋,<sup>⑤</sup>蟻斋云“林庄相伴惜春晖,雨无花绿四围。峡蝶有情勾引我,香风篱外遇蔷薇。”菊池五山诗云:“绿压林园断送红,阶头一种藤芳丛。紫云朵朵香铺地,粉蝶低飞三寸风。”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学或学术修养,他们参与的结社唱和,有助于提升社团的文学品位,为文人交流唱和、切磋结社提供了机会。文化五年(1808)市河宽斋寿,“今岁戊辰宽斋先生六旬生辰,举觞之日,会者如云,宴罢各颁诗扇一柄,诗写《福》《禄》《寿》三绝”,<sup>⑥</sup>大窪诗佛称赞市河宽斋之诗“可谓绝调”,<sup>⑦</sup>社事活动如火如荼,社员们纷纷诉诸吟咏,不绝如缕。

文化十二年(1815),北原秦里、宫泽云山、大窪诗佛刊行《今四家绝句》,其中录有市河宽斋、大窪诗佛、柏木如亭、菊池五山四人七言绝句各百首。龟田鹏斋在《今四家绝句》序云“江户今日之诗,河宽斋之唱,柏如亭、大窪诗佛、池五山之和,风流俊采,皆一代之选。因诗人概称之为曰:江户四家,以云南宋范陆杨尤之四大家”。<sup>⑧</sup>大窪诗佛《诗圣堂诗话》评:“宽斋先生为一代诗匠,与其盟者,如舒亭、梅外、伯美、娱庵辈,皆各成一家。……余常摘近人之句录之,时

① 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② 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1页。

③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

④ 森冈松荫,名世璋,字伯珪。伯珪有子,森冈足庵名班,字介玉,字绿天;森冈柯亭名珊,字贡父。皆善诗。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二,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⑤ 海蟻斋,名暖,字君玉。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二,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⑥ 《福》云“三男五女二孙儿,婿妇相将劝寿卮。一饮须倾十数酒,健肠恐不易支持。”《禄》云:“不养蚕丝不荷锄,一家衣食有赢余。君恩许大无由报,又为儿孙添买书。”《寿》云“六十人生足自多,龟龄鹤算奈顽何?心情未老身犹健,花则狂颠月则哦。”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二,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⑦ 大窪诗佛《诗圣堂诗话》、池田四郎次郎编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年、434页。

⑧ 「今四家絶句」、富士川、英郎編著『詞華集日本漢詩 第十一卷』汲古書院、1984年、5頁。

一出观之,足以慰一日三秋之思矣”,<sup>①</sup>江湖诗社开诚布公的竖立起了鲜明的诗学主张和文化倾向大旗。作品与作者相互影响,专门为诗,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场域。在这个创作场域里,门生相互学习,相互品评,逐渐形成社团特色。

江户诗坛,荻生徂徕成立萱园社,授古文辞学,以唐、明诗为倡,文坛多成拟古之势,古文辞派所尚唐诗及七子学派占据上风。古文辞派信奉者批评宋诗的以义理文字为诗,并指向宋诗俚俗粗鄙的一面。日本近世的文学在宗唐还是宗宋的思辨中展开,诗派之争为日本亦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诗社蜂起,络绎不绝。江湖诗社批判以荻生徂徕为首的萱园派拟古剽窃的文学创作,拥戴二袁与钟惺、谭元春等人,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倾向。诗社指导下的尊宋诗论有效地帮助诗人们将日本的民族风俗和民族细腻情感更贴切的融纳于诗作中,有利于日本汉诗的本土化和大众化的实现。

江户时代,中日交流更加便利,明清时期大量的诗集、诗话著作流入日本,日本汉诗界的诗话著作亦呈蓬勃之势,唐宋诗之优劣更成为日本诗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江户汉文学受明代文坛影响,与明代派别林立相类。对中国诗论主张的取舍逐渐明晰,文学批评意识增强,出现了以诗话为中心的诗学著作,这也是社团群体思想与意志的集体反映。江湖诗社中,山本北山著《作诗志彀》、《孝经楼诗话》、菊池五山著作《五山堂诗话》、大窪行著《诗圣堂诗话》,在大量诗话的催化剂下,诗坛“唐宋诗之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山本北山先生,文章博学为海内一人。元享年间伪诗之徒流毒一世,及先生出,首唱中郎之清新,排击李王之腐调,盖所谓用大承气汤也。近日诗风大改,先生之功居多”,<sup>②</sup>大窪行在《诗圣堂诗话》中充分肯定了在清除古文辞派以来所谓“伪诗”流毒方面的贡献。“今人推崇李于鳞,就如同浮图氏推崇佛祖。因此,以撰写词藻为第一,不重视诗意的深浅,以及趣旨的有无,总是剽窃古人之词句,仿古人之风”,<sup>③</sup>江湖诗社的诗人们针对当时诗坛问题,严厉指出盲目名人膜拜的现象,造成写诗只追求辞藻,无暇内容旨趣,以致剽窃成风。

“诗贵平淡。平淡,诗之上乘也。然平淡不经奇险中来,则徒是村姬絮谈耳,全无气力焉。故学诗先觅奇险,而后温雅,而后平淡。诗到平淡,而诗之能事毕矣。”<sup>④</sup>江湖诗社极力推崇新奇清新的宋诗、反对古文辞派的诗学观尚有成效,“独奈近来都下诗风日变,或为中晚,或为宋元。三体诗、瀛奎律髓等书,比之往日,价殆十倍。或谓诗风之变,自江湖诗社始。”<sup>⑤</sup>江湖诗社的主盟们诱掖诗人们诗文创作,并广以指导、点评。“享保以下为诗者,必主唐、明;享和以后为诗者,皆娴宋、元”,<sup>⑥</sup>说明享和以后的江户诗坛,宋诗派取得了优势,成为诗学主流。

① 大窪詩佛「詩聖堂詩話」、蘆洲池田四郎次郎編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年、434頁。

② 大窪詩佛「詩聖堂詩話」、蘆洲池田四郎次郎編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年、431-432頁。

③ 山本北山「作詩誌彀」、蘆洲池田四郎次郎編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年、15頁。

④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⑤ 《宽斋先生遗稿序》,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6页。

⑥ 赤澤一堂「詩律」、蘆洲池田四郎次郎編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年、456頁。

《五山堂诗话》评“唐人诗不胜学，宋人学不胜诗。唐诗温润，有春水四泽之象；宋诗磊阿，有冬岭孤松之象。唐则满朝诗人，宋则不过数家，只斯数家，优足与全唐诗人抵敌，此宋诗所以称雄也”，<sup>①</sup>社员勇于发声鞭挞现世诗坛，一针见血，在对模拟唐诗施以攻伐的同时，对宋诗进行充分的肯定。“近今之诗，盖有七病焉”，菊池五山在《五山堂诗话》卷三中指出了作诗之人七种弊病：一味沽名钓誉、诗作自炫其奇毫无新意、驾以立己张冠李戴、诗人稍有诗名即应酬无间、才疏学浅不成文理、诋人欺己，不知耻、诗文鄙情俚语，率易成篇等其中弊病，并称“外此七者，欲求真诗，吁亦难矣。”<sup>②</sup>

用奇语是学宋人诗的必由之路。在诗社的号召下，社员们喜好突兀奇崛之字装扮诗作，喜记奇事怪类入诗，故出现了诗好猎奇、文求尖新、字生奇语的毛病甚多。诗社内部学员时有临摹宋诗者，“今日读诗，徒有摘生奇语，思供作料，不问意兴所托，不省格律所在者。作诗徒有何皎字句，毫无音节，不用烹炼之功，不求琢磨之益，皆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矣”，<sup>③</sup>江湖诗社内部社员学宋人的用奇字本身倒是无可指责，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否融化一体、浑然不觉才是重要的。“唐诗自有唐诗字面，宋诗自有宋诗字面，今人不择，随手混用，殊为欠炼。譬之化饭道人沿门乞米，钵中所受，新旧精粝，纷然相糅，煮熟到口，只是救饥，不复知真风味所在，此等诗，余目为化饭体”，<sup>④</sup>菊池五山认为，杨万里诗诚然诗料丰富，奇字迭出，但他善于点化，有烹炼之功。有些日本学宋诗者，只知采擷字面，徒有竹复，无天来之功却硬做堆砌之实，他戏称这样的诗为“化饭体”，这样的诗人是“烹蛇享客”，没有学会杨万里融化烹炼功夫的精髓。所以诗社领袖们不主张初学者学之，恐致“不善学之祸”。此外他们还严斥唐宋诗风不分，混淆其意者，“作伪唐诗者，刻鹄类鹜，其言虽笨，犹且不失君子体统；宋诗失真，则画虎类狗，其言庸俗浅陋，与俳歌谚谣又何择焉？乃嚙然自称宋诗，妄不亦甚乎！其病坐不才无识而已。故学宋诗，必须权衡，唯有才识可以揣度”，<sup>⑤</sup>为了矫正此风，诗社反对社员因斗才而挖空心思想出的生疏的字词或表达方式，妄造字句，致使诗句文理不通。由此一来，这些本可以添色的“奇字”，反成为诗人争奇斗艳、展示“奇才”的载体，导致作诗不辨良莠，一味片面追逐宋诗俚俗奇巧形式而过犹不及，误入歧途。

①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三，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3 页。

②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三，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5 页。

③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2 页。

④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8 页。

⑤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8 页。

### 三、结社活动外延、诗风辐射各地

市河宽斋《重新结江湖社十二韵》诗云“昔我在江湖，自称诗社长。诗道明如日，云雾奈不朗。同盟当俊彦，歌咏多真赏。一时诗坛上，吾党臂可攘。”可见文学领袖以其非凡的影响力，往往会成为结社的号召者，登高一呼，立即有大批追随者响应。市河宽斋作为一代诗匠，自开诗坛以来，一时从游者如云“江湖诗社得人，于斯为盛”。<sup>①</sup>王文荣先生称“文人社团不仅是个体意义上的文人聚合体，有时一个社团常常就是一个文学群体，如果再有一二魁杰提出鲜明的文学主张，这样的群体往往会发展为文学流派”，<sup>②</sup>道明了文学群体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若由诸多文学大家组成的社团，文学倾向将会更加明显。江湖诗社即为一个具有鲜明文学风尚的社团，参社成员在结社唱和中，求同存异，文学主张方面的个体差异性逐渐隐去，而共性逐渐突出、放大，文学社团群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文学中心。

人文渊藪的地域更容易形成结社的集中聚集。江湖诗社在内部聚合的基础上，也产生社事的外部延伸，不仅限于京都、江户、大阪这三个中心城市，其他地方也纷纷结成诗社，结社的地域不断扩大向周边地区辐射。文人结社具有传承性，除了在江户结社，江湖诗社的社员们外省游各地时，或频频与当地社团交友论文，或另结新社，使结社形成规模化的效应，江湖诗社以江户为中心，向各地辐射，遍地开花。具体参见表 1。

表 1 江湖诗社主要成员

诗社成员	成员简介	所结诗社
市河宽斋	(1749—1820)名世宁，字子静，号宽斋、半江。著有《宽斋遗稿》、《日本诗纪》。	江湖诗社、香山诗、小不朽诗社。
山本北山	(1752—1812)，名信有，字天禧，号北山，学半堂逸士。著有《作诗志彀》。	江湖诗社、竹堤吟社、不思池诗、西园精舍集、二瘦诗社。
柏木如亭	(1763—1819)，名昶，字永日，号如亭。著有《诗本草》。	江湖诗社、晚清诗社、伊势诗社、小不朽诗社。
菊池五山	(1769—1849)，名桐孙，字无弦，五山、娱庵皆其号。著有《五山堂诗话》。	江湖诗社、浪华结社、伊势诗社、同人诗社、京都诗社。
岛梅外	(1772—1841)，名筠，字克从，号梅外。	江湖诗社、二瘦诗社、香草社。
大窪诗佛	(1767—1837)，江户后期汉诗人，名行，字天民，通称柳太郎、行光。诗佛、瘦梅、诗圣堂皆其号，著有《诗圣堂诗话》。	江湖诗社、二瘦诗社、晚清吟社、诗圣堂诗会、尚齿会、百花庵集会、泛舟集会。
梁川星岩	(1789—1858)，名孟纬，字公图，号星岩。有《西征集》、《星岩集》、《星岩先生遗稿》。	江湖诗社、竹堤诗社、古碧吟社、玉池吟社、下谷吟社、白鸽吟社、玉吟诗社、七曲吟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成。

① 江村北海「日本史詩」、蘆洲池田四郎次郎編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年、160頁。

② 王文荣：《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页。

柏木如亭在信州中野开设晚晴吟社，“如亭开坛坵，所得人才，不下数人，而以木百年、高圣诞二子为翘楚。高则余未识，木名寿，近日出都始相遇于诗佛席间。风貌伟然，诗笔最高，佳句云：‘心冷句中因说水，脚劳梦里为登山。’皆趣，其社号晚晴吟社，晚晴者，如亭信中读书堂名也”，<sup>①</sup> 晚晴吟社著有《晚晴堂集》，菊池五山称其为“诗极精细，美不胜收”。<sup>②</sup> 大窪诗佛与柏木如亭共创二瘦诗社，大窪诗佛《诗圣堂诗话》中：“余尝与如亭开诗社于东江精舍，号曰‘二瘦诗社’，来与盟者百余人。北山先生作之引。故不受一星半银、半尺之布。痛斥世之为李、王者。于是，格调之徒猪怒虎视，议论汹汹不止焉；由此得人亦不少。世之刺我、非我，于吾乎何有？”<sup>③</sup> 该社倡导宋元之诗歌，提倡性灵，“余尝构江山诗屋于玉池边，唱宋元清新之诗”。<sup>④</sup> 菊池五山客居浪华时期与当地入马国瑞结社，“戊午岁，余客浪华，有云台叟，侨居极近，屡往参其诗社，一时相会者，今皆忘其姓名，独记马光升，字国瑞，不复知其存亡何如”。<sup>⑤</sup> 菊池五山客居伊势又与柏木如亭开诗社，“余久客伊势，前后入社殆数十人……如亭游其地，重结诗社，所交者皆青年辈，……如亭就中举尤者三人，吉雉字凤奴，杜鞠字佳友，宇芋字草池，为抄数章寄余求人诗话中”，<sup>⑥</sup> 面对社内新晋之秀，他并不吝溢美之词，“静胜，号迪斋，学诗于余者，独迪斋原生吟筒往来至今不绝，迪斋诗笔最隽，余尝为其序绝句集津津道之。今录近艺中可观者”，<sup>⑦</sup> 迪斋有诗《冬日杂题》：“八尺身材曲似弓，怯寒侧卧小斋中。怪生簌簌隔窗响，一树棕榈簸雪风。”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录迪斋原生诗三首，另两首分别为《秋夜》、《新寒》，内容见注，菊池五山作为伯乐赏识人才，大赞迪斋“皆不愧才人吐属。”<sup>⑧</sup> 江户时期，僧云室在西洼光明寺开设“小不朽诗社”，“云室昔日唱小不朽社，当时订盟者，桐君兰石、柏如亭、平梅溪、源台山、边赤水、高西巷、田好古等八九人，轮流为主，盛作诗画之会。后如亭去都，梅溪下世，此会中绝，二三年来，云室继而新之，参与者西圭斋、野西湖、滕琢斋、服古颠、藤三

①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7 页。

②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7 页。

③ 大窪诗佛「詩聖堂詩話」、池田四郎次郎編著『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1972 年、454 頁。

④ 「星岩丙集」、富士川、英郎編著『詩集日本漢詩 第十五卷』汲古書院、1989 年、237 頁。

⑤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四，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7 页。

⑥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9 页。

⑦ 《五山堂诗话》卷一录迪斋原生诗《秋夜》云：“疏雨过时欲二更，松窗月白骤凉生。纱灯一点人无寐，满院清风蚯蚓声。”《新寒》云：“惻惻霜威入薄丛，柳枯蕉败不禁风。小枫解防寒计，满脸今朝潮醉红。”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9 页。

⑧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9 页。

林,而台山、西巷岿然尚在,数子皆累于画,吟诗者唯台山、西巷、琢斋三人耳。”<sup>①</sup>该社为诗画会,以画入社,极大地激发了社员们的创作积极性,也丰富了诗社的内容。菊池五山与大窪诗佛、山本绿阴在京都结诗社“余与诗佛、绿阴诸人同结吟社,往来不绝。绿阴《春游》六言云:‘吟身去领年华,踏遍山阿水涯。红影隔桥酒市,涛声出竹茶家。多情远趁狂蝶,出意还逢好花。归路云昏头上,前村催雨啼蛙。’人争诵之。时有京客索余题扇者,余偶然书此诗以赠之。”<sup>②</sup>在该卷中菊池五山还记录一件趣事,“时有京客索余题扇者,余偶然书此诗以赠之。一日余家诗会,京客亦至,忽语余曰:‘昨所见书扇上题诗,风趣绝佳,定是唐宋名家之作。’余座间指绿阴示曰:‘此即涛声出竹茶家先生矣!’其人愕然。绿阴名谨,字公行,北山先生之子也。”<sup>③</sup>菊池五山赞绿阴其才,并收录其诗会作品《春草》入《五山堂诗话》。<sup>④</sup>以上诸多社事皆因地制宜,使得江湖诗社诗风诗论在不同水土地域孕育滋生,繁衍不息。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而后始克成流别,于以永传”。<sup>⑤</sup>以结社的形式对文学主张进行宣传,文学名家的导向,江湖诗社加持的惯性与效能,比比皆是,的诗社显示出相当的活力。这些外延的诗社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活动,使得集会成为文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领袖们以教化为集会目的,有了派别与门户的观念。作为代表性的文学群体,在文学层面上,江湖诗社清楚地显示了文人结社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的关系,对日本近代文学史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 四、奖掖提拔后生后辈,品第、标榜指点诗艺

江湖诗社不仅是一个以文会友的雅集活动组织,更是一个严谨专业的学术团体,除组织雅集唱和之外,还有学术层面的文化传播,不单吟诗作赋,更维系着汉诗风向传承的文化重担,诗社元老们激励后辈学诗作诗,并投身其中躬身践行互相切磋,充分显示了文学领袖对社团的积极凝聚作用。

“宽斋先生主持风雅,爱才如命,其在门墙者,如原长卿、田德郎、胜善长,皆少年能诗,德郎诗情最佳,余亦深喜后起有人”,<sup>⑥</sup>在《五山堂诗话》中,菊池五山记录了被市河宽斋赞赏的

<sup>①</sup>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sup>②</sup>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三,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

<sup>③</sup>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三,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

<sup>④</sup>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四,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sup>⑤</sup>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sup>⑥</sup>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这几位诗人作品。原长卿《晓意》：“无复人来消受凉，独乘清晓步池塘。星河半落风才定，占断荷花自在香。”胜善长《苦热》：“午热如焚汗似浆，北窗困睡到斜阳。雷声雨涩两三点，不送人间一掬凉。”田德郎《春晓》：“晓光漠漠暗窗纱，料峭轻寒一段加。残梦无端被莺唤，半庭残月在梅花。”《晚春》：“无数清愁付枕边，春痕况又到啼鹃。下帘不忍看花落，睡过风风雨雨天。”后辈俊贤代有人才出，市河宽斋不免感叹时光蹉跎，“白首耽吟咏，才知脱旧习。后辈多作者，曾言未三十。”<sup>①</sup>此时期诗社的习作具有学堂性质，诗社领袖积极奖掖后生、不吝传授技艺，在切磨评品中帮助社员们将诗话中的“外露”的诗学观念不断地“内融”于作品中。□

菊池五山在《五山堂诗话》中记录了江湖诗社的新起之秀们，如松则武、宫泽邦达、工藤元龙等。“江湖晚进才子极多，其尤者吾录二人焉。一，松则武，字乃侯，《秋海棠》云：‘翠罗衣袖淡红唇，自试娇妆八月春。石竹后芳何得比，木莲虽艳恐非伦。烟中肠断秋寒夕，露下头垂雨冷晨。幽姿生怕西风暴，墙阴相倚护贞身。’宫泽邦达，字上侯，《跳子》二绝云：‘满江明月满江风，渔唱商歌西复东。别有游人趁凉去，弦声近在画船中’”。<sup>②</sup>又诗云“危楼当面晓瞰红，宿酒醒时坐受风。知否海天奇绝处，征帆影落蘸金中”。<sup>③</sup>宽斋慧眼识才，并对有志之士倾力相助，“津轻书生工藤元龙，名犹八。远来入昌平学，性孤介，自比祢衡。诗有明七子气魄。宽斋先生时为员长，怜其悬而有才，独善遇之。后激变生事，其侯怒拘下之狱。时先生辞职在矢仓，闻事出不意，为致书有司，诉其冤状，遂得免。生有《出狱口占赠先生》一律云：‘缥翅衔冤亦一奇，有人济我义何涯。海阔吞舟初漏网，林深枯木再生枝。仍旧乾坤须独往，依然山岳为谁欵？无那男儿睽夙志，瓦全今日愧君知。’”<sup>④</sup>正是因为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相互砥砺，文学主张渐趋统一，创作倾向不断融合，江湖诗社才能在江户得到发展并不断壮大。

除了对才俊们诗歌进行评点赏析，江湖诗社老人们还会适时提拔后世，主动将诗艺拔萃的后生纳入社内。“竹所君，讳成文，澹斋君同族。诗情蕴藉，在公之暇，屡开文宴。与其社者，如谷麓谷、滕粲堂、源波响、野醉石、山蕉窗诸人，俱为一时之选。”柏木如亭惜才荐才，“近因粲堂致意，引余相见，殆如平生欢。”并收录其诗，加以评点，“读其《夏日杂咏》三十首，清脆可喜。今录一首云：‘家在小桥深巷东，柴门常闭锁幽丛。池头晓过新荷雨，檐角昼生疏竹风。蝶认瓶花来簟上，蜂窥研水入窗中。无端睡起逢茶熟，书课重收半日功。’”<sup>⑤</sup>

①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8 页。

②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 页。

③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 页。

④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6 页。

⑤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2 页。

“余酷喜诚斋诗而不敢劝人者，只恐其因以伤指耳。果能同臭味者，吾其可不与哉！今日吾所与者，一为伊势原迪斋，一为越后西雪庄。二人诗各有偏得，不懈将及其成。”面对诗风相同的忘年同人，宽斋溢美之情毫不吝惜。雪庄名皓，字白卿，其诗《听虫》云：“两处虫声和月明，闲人判得一声声。砌边唧唧有时断，输与墙阴尽意鸣。”<sup>①</sup>《秋雨》云：“秋雨前宵较似晴，今朝又是打窗声。菊花有宅知无那，只怕禾头有耳生。”<sup>②</sup>《晚眺》云：“菊黄云白叶如丹，天与秋光偏要妍。却是冬来嫌设色，只将渲法淡描烟。”<sup>③</sup>菊池五山评论其诗，“皆宛然诚斋口吻矣”，<sup>④</sup>此可谓极大的褒奖。不但如此，他们还鼓励后生写作，“梁卯，字伯兔，美浓人，亦来参竹堤社，青年好诗，才冠等夷。”<sup>⑤</sup>另有后辈“间嘉瑞，字芝生，号可亭，亦势人，曾经受业者，客岁负笈东下，余为荐入竹堤社，颇以诗称。”<sup>⑥</sup>

唱和、切磋之外，品第、标榜社员诗作也促进了社团的风气发展，明清社团多有品第，所谓品第，就是对作品评定，分出高下，促使优者更进一层，稍逊者继续努力。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白羊山樵张简”条载记载江南文人的竞评，“饶介之分守吴中，自号醉樵，延诸文士作歌。仲简诗擅场，居首坐，赠黄金一饼。高季迪白金三斤，杨孟载一镒。后承平久，张洪修撰为人作一文，得五百钱。”<sup>⑦</sup>标榜与品第相似，也是一种品评，但主要是优劣之中推举优等，以赞誉佳者为主，这些措施都对诗社的发展起到了帮扶的作用。

对于社中之人良莠不齐的作诗现象，江湖诗社的领袖们择其善者而录之，作为文学界的导向，他们积极教导社员写诗技巧，对于提高社员的文学修养大有裨益。“诗错一字，意味索然，遂使作者地下衔冤。”<sup>⑧</sup>在提携后辈的过程中，诗社重在提升诗艺。如柏木如亭在伊势开诗社，请菊池五山录其社员诗作如《五山堂诗话》，菊池五山阅毕并未觉新奇“所交者皆青年辈，余未曾及见其能诗者。”但在柏木如亭的强烈举荐之下，不得不勉为其难各录其一，“如亭就中举尤者三人，吉雉字凤奴，杜鞠字佳友，字芋字草池，为抄数章寄余求入诗话中。因摘其佳

①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5 页。

②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5 页。

③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5 页。

④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5 页。

⑤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四，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9 页。

⑥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五，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0 页。

⑦ 《甲前集》，载钱谦益主编《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 页。

⑧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四，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0 页。

者各一。”<sup>①</sup>在诗作的最后菊池五山点评“余答如亭札尾署七字云：‘尽是刘郎去后栽’”，由此可见其对诗作品评之严格。

在他们提携的竹堤吟社中，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收录《竹堤社十才子诗集》，“《竹堤社十才子诗集》今又已入刊，北山先生序文”，<sup>②</sup>菊池五山作诗技点评，山本北山主持，“所谓九人者，绳斋石井耕、篁村宫本铉、凉舟山洼鹭、南海稻叶龙、岩山中尾涛、鹤堂盐谷松、寒谷松井樵、吉梦田梓、糙堂斋藤诚是也，篇什太多，拾收不尽，姑摘对句之尤者。鹤堂云‘啼莺花外寺，乳燕柳边家’；凉舟云‘门径无心扫，莓苔尽意封’；南海云‘檐铎风初定，池莲露尚香’；寒谷云‘虫声秋四壁，松影月三更’；绳斋云‘雨后青山近，霜前绿橙香’；篁村云‘闲惯诗情淡，贫知道味安’；糙堂云‘风摇嫩柳眠初起，雨洗夭桃醉未醒’；岩山云‘槐花历乱风前雪，竹影纷披月下云’；古梦云‘帘收竹影知云过，池送荷声判雨来’，声调各佳，读之有丝竹迭奏之想。”<sup>③</sup>在标榜激励中促进后进社员们孜孜向学，锐意进取。他们就诗论诗，大力奖掖后辈新秀，因材施教的提携方法，使得社团和宗派意识的增强，因此提高了诗社、宗派同人的向心力，结社作诗论法的才情风雅成为了江户时人的文化生存方式。

## 五、闺秀老叟亦能吟诗结社

自江湖诗社力排伪唐诗，海内靡然向宋诗，实胚胎于宽斋教诗之法，但自家局定，游刃有余，而后翕然赴之者甚多。江户时期的汉诗的创作主体不再以天皇、贵族、朝臣、禅僧等社会上层阶级为主，而是转移到以儒者及町人等下层阶级。从社员人群分布来看，有朋僚志同道合者，有父子叔侄一门家族的，有夫妻共同参与的，有闺阁家眷，还有地方官员，有寺院诗僧，皆纷纷投身结社。老有耄耋，少有志学，文化参与着民众的社会生活，表达着民众的喜怒哀乐。

江湖诗社对外广纳贤士，其中亦包含女弟子。女性入社习作汉诗，突破了结社的血缘、地缘、民族地域和社会阶层的限制，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录有闺秀结社诗，内中闺秀多为江

<sup>①</sup> “吉《扫庭》云：‘一番扫去一番翻，手把青鸾不惮烦。也是颠风来作恶，坠红如雨扑黄昏。’杜《冬夜》云：‘深夜残灯缀玉虫，冻云酿雪月朦胧。布衾如铁肌如水，卧听篱头笔策风。’宇《新秋》云：‘清晨风露饱牵牛，娇花柔蔓一篱秋。应怕红曦来迫杀。自将碧伞覆梢头。’”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sup>②</sup> 所谓九人者，绳斋石井耕、篁村宫本铉、凉舟山洼鹭、南海稻叶龙、岩山中尾涛、鹤堂盐谷松、寒谷松井樵、吉梦田梓、糙堂斋藤诚是也，篇什太多，拾收不尽，姑摘对句之尤者。鹤堂云‘啼莺花外寺，乳燕柳边家’；凉舟云‘门径无心扫，莓苔尽意封’；南海云‘檐铎风初定，池莲露尚香’；寒谷云‘虫声秋四壁，松影月三更’；绳斋云‘雨后青山近，霜前绿橙香’；篁村云‘闲惯诗情淡，贫知道味安’；糙堂云‘风摇嫩柳眠初起，雨洗夭桃醉未醒’；岩山云‘槐花历乱风前雪，竹影纷披月下云’；古梦云‘帘收竹影知云过，池送荷声判雨来’，声调各佳，读之有丝竹迭奏之想。

<sup>③</sup>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四，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湖诗社领袖们收纳的女弟子,或是社员家室。“余每逢闺秀诗,必抄存以广流传。东湖有女弟子林氏文凤者,年未及笄,颇善吟咏,平生读书有儒素风,又学书法于东洲老人,殊为秀媚。”录其诗一首《春晚》:“野杏山桃乱晚风,一年春水太匆匆。痴心却爱蜘蛛巧,更吐纤丝緘坠红。”并记载其“真清操女子也”之事,“其最可喜者,有人持扇索题清杨次也《西湖竹枝》者,文凤以诗拒之曰:‘扇头求字愧君知,欲写还嫌多艳词。瓜李由来人所慎,懒书次也竹枝诗。’”<sup>①</sup>江户时期已有女性结诗社现象,如江湖诗社倡导人山本北山女弟子文姬即参与结社,“《竹堤社十才子诗集》今又已入刊,先生序文,大抵取‘有妇人九人而已’之语立意,盖以文姬居其一也”。菊池五山摘录小窗诗句入诗话,“比来闺秀钟于北山先生一家。先生之女弟子文姬,号小窗,聪慧能诗,摘句云‘梅子欲肥先酿雨,竹孙稍长不禁风’,‘瓶花改换经旬水,绵服成褌连夜寒’,皆娴雅可爱。”诗佛读罢另赠诗云:“莫把清愁吟向天,人间滴堕有深缘。如今谁怪香薰骨,元是玉皇前殿仙。”北山先生弟子云章,“年才过笄,极爱诵书,不愿适人,亦奇女子也。先生绛帷讲书,此二人每捧册侍侧,殆有南郡家风。”<sup>②</sup>

江湖诗社后起之秀梁川星岩在京都结白鸥诗社,其妻“红兰张氏,名景婉,字道华,梁星岩之室也。盖梁氏之室,世有贤操,然伯鸾之妻,貌不称德,才华亦逊,其优劣岂待辨哉。”<sup>③</sup>后梁川红兰、小原铁心、江马细香与村濑藤城等文人纷纷加入白鸥吟社。弘化三年(1846)江马细香与小原铁心结成黎祁诗社。嘉永元年(1848),江马细香与小原铁心又结咬菜社。<sup>④</sup>江马细香以闺秀身份进入诗坛,颇得江湖诗社中人褒奖“有闺秀细香,名多保,字禄之,书画俱佳,最善墨竹,诗亦清婉,幸见收录,余使诵诗,《晓起》云:‘庚如李一星明,独先啼鸦绕砌行。知道夜来微雨过,芭蕉残滴两三声。’《冬夜》云:‘永夜如年对短集,讎书课了未三更。纸窗移上梅花月,撩得诗愁睡不成。’真乃绝世聪慧,已而扣之,知是江马兰斋之女。”<sup>⑤</sup>文化的普及率提高,女性诗人也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女性进入诗歌的创作文化群,并在这个群体合力的作用下,规模化地推动江户文学向前发展。

在诗社的影响下,社员作诗更加生活化,不徒唱高华之调,而更关注日常生活事物。汉诗飞入寻常百姓家,故社员家人时有能言诗者,“郭晖远寄家信,误封白纸,妻答曰:‘碧纱窗下启緘封,尺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又有松涛女史,名珞珞,字玉

①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二,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②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页。

③ 菊池五山:《锦天山房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

④ 江马细香(1878—1861)名裒,字细香。小原铁心(1817—1872)名忠宽,字栗卿,号铁心。菊池五山:《锦天山房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

⑤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四,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页。

声,社员土井德人之妻。“性娴雅,好吟咏,德人为写数首见寄,《折菊》云:‘小园折取最繁枝,插得瓶中看也宜。痴蝶定知无著处,飞来依旧绕东篱。’《冬景》云:‘一径萧条霜后天,老筠护绿小桥边。寒流水浅二三尺,双鸭尚依枯荻眠。’”<sup>①</sup>

江湖诗社作为宋诗的引向标,“昌言排击世之伪唐诗,云雾一扫,荡涤殆尽,都鄙才子,翕然知向宋诗,其功伟矣。”<sup>②</sup> 一经推崇,宋诗在当时有了极大的受众,时有“山本北山、市河宽斋奉宋元诗,而其风天下风靡”<sup>③</sup>之说。《五山堂诗话》中记录两则小事,足见江湖诗社“久向江湖唱性灵”<sup>④</sup>之果效。菊池五山偶然路上拾得一扇,扇上蝇头《人影》五排一首,题扇诗云“夕阳长且瘦,午景短而倭。暂向花边别,又于月下扶。寒灯相作伴,旅馆未曾孤。照镜何须问,落杯遽欲呼。无臭无声也,不言不笑乎”,路拾之诗竟觉巧而不纤,于是“令爱而藏之,不复知何人笔也。后知是秋田诗人平泽通文所作”。另有卷五记载,淡海人国华,字子琏,吐句如屑,累篇不倦,“年垂七十,又来交余社。自云比年所作,已过万首。自今而后,更千更万不为难也”,菊池五山回赠垂垂老叟,诗云“吃来一斗饭,吟了万篇诗”,<sup>⑤</sup> 无论是路偶拾扇还是老叟写诗,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瞥目一窥都足以证明标举清新宋诗的诗风已然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流。

宽政末年社事凋零,宽斋感叹“但愁诗社寥寥,飘落四方,使人愈益思足下而不置”。<sup>⑥</sup> 随着诗社诸子四散流寓各地,社集逐渐寥落,“无弦既以自造之罪,流落京摄之间;天民亦寻西游,不知今何在;伯美依旧宰野火止;唯海大夫及克从,时聚首于一堂之上,共为一长大息而已。天其不欲大雅之再起乎?”<sup>⑦</sup> 菊池五山感慨“人生聚散亦复难常。二十年间,江湖社一离一合,吟席殆无暖日。乙巳,余归江户,如亭见赠云:‘叶水心初宦途,四灵复聚旧江湖’。后宽斋先生祇役越中,如亭去赴信中,余亦出关,诗独佛留在江户。如亭寄诗云‘结社都门相唱者,半江翁北五山西。竹埋深雪无生意,只有梅花照旧溪。’如亭一号瘦竹,诗佛一号瘦梅故也。余再归则如亭犹在信中,每一聚首,未尝无车公之叹也”。<sup>⑧</sup> 诗社一时意气奋发,堪称诗坛执牛

①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②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页。

③ [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学的影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4页。

④ 大沼枕山「枕山詩鈔 下卷」、富士川、英郎編著『詩集日本漢詩 第十五卷』汲古書院、1989年、454頁。

⑤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四,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44页。

⑥ 市河宽斋『寛齋漫稿 下』遊徳園、1926年、105頁。

⑦ 市河宽斋『寛齋漫稿 下』遊徳園、1926年、105頁。

⑧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耳,在高潮散去后,昔日社员空有对江湖诗社声气相通、志趣相投情操的怀念与追思。“追忆尔时光景,宛然在目,园今归他姓,同社者虽曰无恙,未必无俯仰之叹也”。<sup>①</sup>

## 六、结 论

江湖诗社的存在绝非偶然,它促进了日本近世文学结社活动作用下汉诗风雅的大众化。诗社的集群创作活动有赖于声望文人的招集,社员们的竞采风流,以及诗学主张的流派师承等。在层出不穷的唱和、切磋、品评、竞赛、结集诗话等方式中,活跃了江户文坛。江湖诗社在诗法唐宋上的批评理论,既是日本文学批评史的一部分,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文化的相引与相斥,本身就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正是诸多因素的作用使然,该社在文学交流与传承中,推动了文人结社的地域性拓展,绘就诗社集群的宏图,促进了日本近世汉文化的发展。

---

<sup>①</sup>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卷一,马歌东编选:《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

---

# 丑闻的生产与主体性建构

## ——以远藤周作的《丑闻》为中心

赵 聪

**内容提要** 《丑闻》是日本战后第三新人作家远藤周作的晚年代表作。结合小说中“丑闻”由传闻到实现的过程以及主人公胜吕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不可言说的“丑闻”既是他的欲望之所在,又是主体建构过程中的巨大威胁,胜吕通过进入与男性世界的权力关系完全不同的女性世界,追逐丑闻并最终实践了丑闻。“丑闻”是胜吕无意识中渴望但又不得不排斥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丑闻”可以视为一种隐喻,体现了远藤在晚年超越伦理层面对罪恶的探究、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女性主义相关议题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 远藤周作 丑闻 女性主义 欲望 主体性

**作者简介:** 赵聪,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远藤周作(Endo Syusaku, 1923–1996)的《丑闻》(「スキヤンダル」, 1986)讲述了一位年过花甲、身患重疾的著名天主教作家胜吕身陷性丑闻的故事。胜吕为了探明丑闻真相,展开了对丑闻事件的调查,在此过程中逐渐身陷丑闻漩涡,最终丑闻成真。远藤通过描写胜吕在欲望和规训间拉锯下炼狱般的精神痛苦,立体地展现了他个人对基督宗教和二战后重建日本民族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在与作者的对谈中,佐藤泰正指出远藤创作两大主题分别是对“一神和泛神”的冲突和“情欲与恶”的探究,作为一名天主教作家,远藤虽已在作品中塑造了软弱的罪人和同伴者耶稣形象,但作品缺少对黑暗世界和恶的描写。他认为远藤的耶稣形象必须能经受得住恶的考验,《丑闻》是远藤对这一问题的回应。<sup>①</sup> 上总英郎认为远藤以从“神圣”转向“世俗”的方式延续了早期对恶的探索,并在“日常性”中为恶探索出路。<sup>②</sup> 山根道公梳理了创作同期的作家日记,发现远藤在这一时期身患重疾,且诸多亲友们纷纷离世,他认为《丑闻》是一部反思死亡和人深层心理问题的作品。<sup>③</sup> 中国学者史军认为远藤在这部作品中深刻剖析了个体

---

① 遠藤周作、佐藤泰正『人生の同伴者』岩波書店、2006年、219頁。

② 上総英郎『遠藤周作論』春秋社、1987年、289頁。

③ 山根道公『「侍」と『スキヤンダル』の間——その変容を明かす未発表日記』『文藝別冊 遠藤周作』河出書房新社、2016年、122頁。

内心深处所隐藏着的黑暗,并指出这是远藤重新审视自己信仰的一种方式。<sup>①</sup>

不难看出,以往学者对《丑闻》的研究多集中于宗教之“恶”和“深层心理”等问题上,少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小说中女性的意义。而远藤周作的文学所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结构的复杂性,侧重宗教视角的分析尚有拓展的空间。因此,笔者试图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拉康的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相关理论,考察“丑闻”的生产和胜吕主体性建构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小说主题进行整体把握,探究作者晚年的创作主体,也尝试将小说放在战后语境中进行重新定位。

## 一、不可言说的丑闻

小说的主人公胜吕是位擅长以宗教题材进行创作的天主教作家,此时正值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一部融合他人生和文学的作品荣获大奖。作为一名著名作家,胜吕有意保持着正面形象,“事实上,打从结婚之后,他就和别的小说家一样,决心扮演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sup>②</sup>可见胜吕深谙“扮演”对维持他身份地位及主体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基督宗教的信仰秩序在性上划定了禁忌,没有被纳入生育的性和欲望在信仰体系的权力运作结构中,被排除在话语言说之外。即婚外情是被禁止的,即便发生,当事人也会对此保持缄默,因为事情一旦败露,被外界知晓,就可能形成丑闻,使当事人身败名裂。因此,基督徒的身份决定了女性和情色对胜吕而言的禁忌属性,他需要拒绝欲望和女性,以远离其可能带来的诱惑以及主体对禁忌的僭越。但这一完美状态被他作品的颁奖典礼上人群中出现的自己的脸的幻象,以及随后出现的女画家石黑比奈打破。石黑比奈在晚宴上喝醉了酒,纠缠胜吕,声称曾和他一起深夜游荡于新宿的樱花节这一花街柳巷。

“好!我懂了。您是不想让人知道深夜和我们一起游荡的事吧!因为是基督教徒!我忘了,没把客套话和真心话弄清楚”(中略)

“哎呀!又在装腔作势了!”她从旁边讽刺,“这次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呢,胜吕先生?”<sup>③</sup>

石黑比奈的发言直接将胜吕置于舆论风波的中心,如她所言,作为基督徒,胜吕丧失了和女性之间诸如“深夜游荡”之类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他的主体必须时刻处于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象征秩序会给予正面评价的、被规训的、模范的身体状态。处在这种状态说明他放弃了自我内在主体的一部分,将自己当作实现社会和宗教规则的工具般的存在。禁忌与欲望之间的拉锯使得“深夜游荡”的丑闻必须被控制在不可言说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可言说是一种传递的缺失和符号秩序的断裂,构成了胜吕主体的创伤。而石黑比奈的言说打破了沉默,“装腔作势”一词提供了言说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对主体工具般存在之真实性的挑战,为胜吕的主体制

<sup>①</sup> 史军:《冲突、和解、融合——远藤周作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sup>②</sup>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sup>③</sup>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造了一个可以逃离象征秩序言说规则的空间。也就是说,石黑比奈通过言说,提示了胜吕的丑闻在场的可能性。

此外,有着三十年交情的同行加纳在性方面向他发出挑衅,“胜吕到这年龄为止从没有真正的玩过吧?还是瞒着我们偷偷地玩呢?”<sup>①</sup>胜吕并没有恪守基督徒的原则而否定加纳,反而暧昧地回答道,“这是连老婆都不能说的秘密,怎么可能轻易告诉别人呢?”<sup>②</sup>他的回答符合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权)即男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物质基础,它们尽管是等级制的,但依然在男人之间建立或创造了相互依赖和团结,以使它们能够支配女性”。<sup>③</sup>男权社会中男性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类似“玩”女性之类的共同活动维系的,有能力“玩”女性的男性被视为拥有男性魅力。因此,胜吕不甘于向众人呈现出没有玩过女人、老实无能的自我形象。这番对话体现了父权制下男性交往中既寻求认可又充满竞争的必然导向。而这里胜吕试图通过这种似是而非且含糊其辞的表述,在社交中赢得其他男性的认可。

加纳所言提示了一种和女性间“连老婆都不能说”的丑闻性关系,这使胜吕意识到自己经验的缺失,这部分缺失是此时被规训的胜吕无法经验到的,因此这种经验对胜吕的主体极富吸引力。也就是说,他“没有玩过的”正是他的欲望所在。而权力法则的运作使得主体一旦触碰禁忌,便会遭受惩罚,于是,丑闻又时刻令胜吕的主体同时感到威胁和恐惧。“性被迫保持缄默——闪闪发光,而且才会使得谈论性即是困难的,又是必须的,即是危险的,又是重要的”。<sup>④</sup>对胜吕而言,被禁止的“性”,既是他主体缺失的欲望所在,同时又时刻令他感到威胁,丑闻作为一种能指,指代的就是这种存在。他的回答也显示了他对这部分缺失经验的在乎,可以说从此时起,胜吕的主体已无法像先前一般,继续心安理得地处在被规训下固化的主体状态,他主体变得岌岌可危。而他面对陌生女性的追问和加纳提问时内心的不甘,也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证明。

象征秩序的话语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制约“身体”来实现的,“身体”以作为主体的容器这种形式参与权力话语的运作。“陈旧的椅子也许好久没上油了,医生看完检查表转过身时,发出‘吱’的声音”。<sup>⑤</sup>长期写作使胜吕的身体承受了极大的负担,医生提醒胜吕一定不能太过操劳,否则肝脏硬化极易转化为癌症。此时,陈旧的椅子发出的声响,象征着他日渐老去不再灵活的身体,同时也无不在提醒着他死亡的临近。身体的衰老和死亡的威胁提示着胜吕的主体去填充内心空白经验的急迫性。“我们蒙蔽双眼,拒绝看到只有死亡不断地保障着生的

①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

③ [美]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著,郭劫译:《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页。

④ [法]米歇尔·福柯著,余碧平译:《性经验史(卷一)认知的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⑤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喷薄(rejaillissement),没有生的喷薄,生命只能衰败”。<sup>①</sup> 巴塔耶指出了生与死这对概念背后的统一性,死亡使胜吕感到恐惧和焦虑,因为死亡会中断他主体的充盈,因此胜吕必须同时间赛跑,填补主体的空洞,可见这种急迫性也是丑闻所给予的。换言之,即便胜吕不愿直面身体的衰老,但衰老和死亡所带来的焦虑使他的主体不得不加速填补缺失的经验。

书写是胜吕主体言说的一种方式,胜吕的主体也通过书写获得宗教和社会身份上的认同。但加纳认为胜吕的写作令人无法信服,“胜吕还没有把握到真正的自我,让人觉得只是用脑子想出来,不是真实的东西”。<sup>②</sup> 一位外国神父也曾问他“你、为什么、不写更美、更好的、故事呢?”<sup>③</sup> 他者的质疑隐含了胜吕作为“天主教作家”之主体认同的困境。宗教和文学间的矛盾是他创作难以突破的壁垒,他想要秉承作家的责任,不让作品沦为服务宗教的工具,并试图在作品中探索罪恶,坚信真正的宗教一定会触及黑暗,宣称负面的罪中也包含着正面“‘再生’的救赎”。<sup>④</sup> 但这终究是胜吕自欺欺人的把戏,加纳一语道破了胜吕主体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即“没有把握到真正的自我”。胜吕主体的空白与欠缺,正是现实中“丑闻”经验上的缺失,也是他需要寻找的真正自我。因此,他通过文学书写的经验进行的探索势必是“不真实”的,而是“想出的答案”,即写作是他主体空缺经验的一种补偿,但他在作品中“用脑子想出来”那般、“构想式”地书写丑恶并未触及真正的恶,且由于种种束缚,他的创作无法敞开讨论“恶”和“性”。因此,此时他的写作作为一种补偿其实并不能完全填充主体的空缺,丑闻愈加成为他的欲望所在,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胜吕无视主体的不安,继续维持禁欲的、被象征秩序格式化的主体的话,就说明他的主体是虚假的。胜吕意识到了自己必须去填补这部分空白,在现实中去追逐不可言说的,一旦进入语言的象征界便可能对他造成威胁、但同时是他欲望对象的丑闻。

## 二、被媒体话语生产的丑闻

记者小针也在追踪丑闻事件,与胜吕要证明自己清白的目的相反,他试图证实丑闻以撕下胜吕的假面。小针幼时曾梦想长大后当小说家,但却和文学渐行渐远,他和胜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小针成为了对宗教嗤之以鼻、试图戳穿名人谎言的记者。如果说此时胜吕的主体是被规训下中空、洁净状态的话,那么这位挖人黑料、生活不检点的小针的主体则处于中空之外的卑贱和污秽的状态。语言使象征秩序划分出了肮脏与洁净的二元,同时也决定了对胜吕这类洁净的主体而言,禁忌的事情是具有威胁且可构成丑闻的,而对小针的主体则不然。“想要使安定的东西产生动摇的心理,和他的正义感混同在了一起”。<sup>⑤</sup> 通过挑战胜吕主体的稳定,小针想证明表面光鲜亮丽的作家其实也不过如此。只有这样,方可证明他现在的主体状

① [法]乔治·巴塔耶著,张璐译:《色情》,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6 页。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 页。

③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 页。

④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 页。

⑤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3 页。

态是更为真实及合理的。这不仅有助于维持他主体的稳定性,珍贵的名人边角料会成为爆炸新闻,带给他事业的成功。可见,小针和胜吕的主体互为反主体(antisubject),他在丑闻生产过程中起到追捕丑闻、推动丑闻生产的作用。

宴会上石黑比奈提到她的朋友系井素子在樱花街为胜吕画过肖像画,胜吕找到了画廊看到了《S 氏的脸》,“那是自己的脸,可是那表情——不是栗本所说的下流,而是淫秽”。<sup>①</sup>胜吕对画像中自己的表情感到气愤和羞耻,这种抗拒说明了画中假胜吕作为他者对胜吕主体的影响。画布充当了一面镜子,看向肖像画的胜吕也被画中胜吕凝视,在胜吕脑海中,这淫秽的笑容和颁奖典礼上脸的幻象发生重合。假胜吕通过对胜吕本人的凝视,失去了原本客体特质,获得了主体性,并反过来拓展和重塑了胜吕的主体。通过画像这一画面“语言”,为丑闻从不可言说的实在界进入语言的象征界提供了可能,并以可视的方式提示了假胜吕和丑闻的在场,推动了胜吕的主体从对自我完美的想象走向真实,也推动了丑闻的传播和生产。随后,小针偷窥了胜吕和成濑夫人的相遇。

作家回过头,做出等人的样子,然后进入对面的咖啡厅。(中略)她好像事先约好似的进入咖啡厅。二人像是旧识,在隔壁桌坐下,很快就谈得非常融洽。<sup>②</sup>

小针对胜吕的“监视”,存在一种“看”和“被看”的权力关系。他作为一名在新闻书写场域拥有话语权的记者,有建构新闻的话语权。下划线的描述不一定是事实,却是小针希望看到的、是他的欲望所在,同时也是一旦被外界知晓,会成为丑闻威胁胜吕主体稳定的内容。川岛秀一认为小针行为背后的推动力来自未显现的无意识世界。<sup>③</sup>无意识的欲望可使他利用媒体话语将此事言说为丑闻。小针盯上胜吕,源于他想要使安定的东西产生动摇的心理,这从象征秩序来看,不稳定是社会意义生产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丑闻的认识对象是故事,它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故事才是目的”。<sup>④</sup>丑闻的消费者是集体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即便没有丑闻,媒体也需要制造丑闻来满足集体的需求。假如没有丑闻,社会将处于一种单一的善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像胜吕最初被规训的主体,固化没有弹性。这种固化意味着权力支配者不可动摇的地位、象征秩序的封闭和僵化。因此,为了维持象征秩序长期稳定且富有弹性的运作,需要类似“爆料丑闻”这种可以让权力者的绝对权力被制约的辅助性机制。小针便是处在这种机制中的人物,他的存在是为了质疑胜吕这类圣人般主体存在的真实性。

小针向加纳打电话并故意透露他看到胜吕前往歌舞伎町看窥视屋,借助电话这一媒介推动丑闻进一步传播。经加纳的提醒,胜吕得知“有一个像从远处就可以闻到尸臭的狗一样的采

①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4 页。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2 页。

③ 川岛秀一『遠藤周作〈和解〉の物語』和泉書院、2016 年、282 頁。

④ [意]约翰纳斯·艾赫拉特,宋文译:《丑闻的力量:大众传媒中的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 页。

访记者,已经开始在调查自己了”。<sup>①</sup>他坚持反驳说这些是捏造的谣言,但加纳并不相信他。加纳的提醒使小针在与胜吕关系中的单向凝视者身份暴露,被胜吕反凝视。胜吕为了避免陷入丑闻,开始声称丑闻事件主角是冒充自己的“假胜吕”。而“假胜吕”邪恶淫荡的特征符合小针对胜吕的想象,成为胜吕设置的一个诱饵,吸引着小针一步步跟进。小针追踪丑闻到了胜吕的读者签名会,同时现场还出现了一位特地来向胜吕道谢的忠实读者,他称自己受到了胜吕作品的积极影响,从而选择在残障儿童复建中心做护工。这本应是一条好消息,但胜吕却对此感到窘迫。在得知他甚至要领洗接受天主教信仰时,胜吕心中非但没有丝毫喜悦,甚至感觉自己是个伪善者,辜负了读者的喜爱。作品中想要传达的真善美的理念和他内心深处对丑闻的欲望间的矛盾,令胜吕感到割裂。他明白自己不是为了教导人或宣传教义才当小说家的,因此,他“内心的齿轮突然开始乱了”,“某种本来密切契合的东西,从颁奖典礼的晚上起,突然合不上了”。<sup>②</sup>原本密切契合的是象征秩序的言说规则和严格遵守言说规则的完美的主体,随着对丑闻的追踪,胜吕逐渐意识到他作品中罪恶描写的虚伪和不真实,因此,他对作家的身份认同开始产生动摇,这种认同的松动使胜吕的主体岌岌可危。回到家后,胜吕开始回想自颁奖典礼以来和丑闻相关的经历。

在颁奖典礼的会场,看到和自己相似的脸。那张脸还和并列在画廊的肖像画重叠,两者都露出下流卑俗的浅笑。(中略)

(这就是你,你的脸,和那肖像画有何不同呢?)

他的内心也如此自问,一向只在意社会评价和读者眼光的他突然感受到了压力。

那天深夜,他被电话铃声吵醒。<sup>③</sup>

胜吕在镜中看到是张“充满倦意的脸”,这张脸上眼睛黄浊、两鬓白发,他对自我的认知逐渐摆脱社会评价和读者的眼光,他意识到好丈夫和好作家不过是象征秩序规训的结果,他眼中自我的形象开始和下流卑俗的假胜吕重合。可见,典礼上出现的“那张脸”所揭示的内容就是丑闻本身,这是胜吕和丑闻这一能指的第一次会面,由此,这张脸介入了胜吕主体的建构。随后,胜吕遇到了自己表情淫荡的肖像画、听到了关于自己丑闻的言说,胜吕看和听的实践推动着他的主体将最初的想象变为现实。丑闻及其传播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传播中所描述的场景是胜吕主体在写作中幻想的场景,以及在之后会实现的场景;传播中所描绘的胜吕的形象是他假面背后真实的形象。恶作剧般的骚扰电话是丑闻的一部分,扰乱胜吕的正常生活,只有最终实现丑闻,他内心的空洞才能被真正填满,缺失的经验才能被补全。

### 三、在女性世界中被颠覆的丑闻

从那年冬天颁奖典礼之后,就觉得自己身上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有一只手想摧毁自

<sup>①</sup>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

<sup>②</sup>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0页。

<sup>③</sup>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1页。

已至今建立起来的世界,把我从那世界拉走。那只手想把我抛弃到从未想过的,有恶梦般的世界。要把我带到发上沾满蜡烛、半开的口中舌头蠕动的女人的世界中。<sup>①</sup>

这只手象征了胜吕内心对丑闻的欲望,胜吕追寻丑闻中遇到了几位女性。通过成濑夫人,胜吕了解了素子等女画家的特殊之处,她们主张“丑的美学”,声称“无论再丑的东西里也含有美,找出美的部分才是绘画”。<sup>②</sup>可见,女性一反在传统绘画中被男性凝视的客体地位,成为手握画笔拥有话语权的画家主体,并通过作画凝视男性,被远藤赋予了洞悉及推翻男权秩序的权力。作画是她们发声及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她们在画作中露骨地描绘被男权视为丑的内容,主张一套有别于男权话语的对人性及美丑的解读。“丑的美学”说明两性在处理美丑这一符号的底层逻辑是截然相反的,女性取消了美丑间的二元对立,颠覆了划分美丑所依据的象征法则和等级秩序。这种丑的美学是她们洞悉人性的工具,这和胜吕试图通过作品凝视罪恶,进而寻求真正宗教的欲求相呼应,也暗示胜吕必将进入女性世界来确立真正的自我。在女性的世界里,丑获得了新的美学意义,因此丑闻也不再是丑的,女性通过用画笔把握男性形象的方式参与丑闻之中,推动丑闻的生产。另外,画中假胜吕的形象是画家结合她的审美及她对胜吕主体的思考塑造的,同拍照纪实的记录方式相比,观看者对画中形象的辨认更具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向画家求证。因此,肖像画凭借其模糊性和流动性的表达为丑闻事件拉开了序幕,也为丑闻事件的发酵赢得了时间。和女性不同,小针在丑闻事件中试图运用照片来进行曝光。照片可精确锁定当事人,使其陷入无可辩解的境地,占据了传播链条中权力地位和话语言说权威。

和胜吕初次见面成濑夫人便毫不忌讳地谈论起“性”的话题:“性会暴露出连他本人?也没察觉到的内心最深层的秘密”,<sup>③</sup>她指出胜吕基督徒的身份使他常把性和罪联系在一起。二人谈论着不可言说但又吸引胜吕的话题,保持着一种不方便被人知晓的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丑闻,令胜吕感到既危险又兴奋。吸引胜吕探寻丑闻的欲望同样驱使着他去和成濑夫人见面,成濑夫人宛如《创世纪》中引诱厄娃偷食禁果的毒蛇一般,而她对胜吕的吸引正体现出她在丑闻生产中的导演角色。对胜吕而言,寻找画像、和成濑夫人聊天、同她通信的动力,均来自被压抑的、被禁止谈论的性和身体,而在这种重复的寻找之中,胜吕收获了触碰禁忌所带来的一次次的愉悦。成濑夫人在信中讲述了亡夫成濑俊夫在战场上的故事和二人的性关系。成濑是一名研究员,他性格温柔、为人忠厚,但在性上有着强硬的一面。

那是眼里布满血丝,带有残酷表情的脸。“谁?你是谁!”我感到不安,不,不是不安,是恐惧让我叫了出来。<sup>④</sup>

“眼里布满血丝,带有残酷表情的脸”并非日常状态下的人脸,更像是杀人时杀气腾腾的

①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98页。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98页。

③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

④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页。

脸,看到这张脸的人会本能地感到害怕。成濑曾两次残杀妇女和儿童,第一次在军部命令下,第二次他自己擅作主张。战争中他在军令这一大他者的许可下,逾越道德界限杀人的行为被意识形态粉饰为善,品尝到了杀戮的绝对之恶带来的极致快感,在这种快感的驱使下,第二次他违反了战争法则对平民进行了屠杀。这种屠杀是在法则秩序之外的属于野蛮的范畴,标志着符号的断裂,因此难以用语言进行描述,属于不可言说的范畴,这是成濑的创伤。在战争结束回归日常生活后,成濑的内心无法像无事发生一样而对屠杀无所反思,否则他将无法回归正常的道德主体结构。如何合理化战场上的行为,成为他处理主体困境的关键。战场上杀戮的冲动在回归日常生活后,依旧无法正常地被压抑,这种冲动被转移到了性行为中。也就是说,战场上对妇女儿童暴力行为,变成了性行为中“粗暴”<sup>①</sup>的行为。性关系中存在着象征性的谋杀,例如基督宗教“合二为一”的描述,表明了性中存在隐喻性的死亡,拉康称之为死亡的享乐(拉康指出死亡冲动并非是一种单独的冲动,而实际上是所有冲动(DRIVE)其中的一个面向,他认为“每一冲动实质上都是一个死亡冲动”(Ec,848),其原因之一在于每一冲动皆是一种旨在超越快乐原则而抵达过度享乐(JOUISSANCE)之领域的企图,享乐在那里被体验为痛苦。<sup>②</sup>)。“这两种矛盾的东西构成了丈夫,这对我是冲击同时我甚至体会到了快感”。<sup>③</sup>这段不可言说的经历构成了成濑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令成濑夫人兴奋,同时,她意识到在二人的性关系中,自己处于被屠杀的妇女儿童的位置,“那时他射杀了小孩的母亲和孩子……想到这里,突然从脚尖到头顶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快感迅速流窜”,<sup>④</sup>可见,成濑夫人在战后,经由性体验到了战争体验。

远藤认为女性对他者的目光更为敏感,因此女性分得清顺应社会规训带面具的自己,和素颜真实的自己,<sup>⑤</sup>成濑夫人是远藤基于对女性这样的认识所创作的人物,她认为在人心中存在一股超越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转变为难以压抑的冲动,最终成为对道德的背叛。成濑夫人通过写信,点燃了胜吕心中的这种力量,这构成了他不愿直面的另一面,即丑闻本身。正如菅聪子所言:“成濑夫人通过曝光自己‘秘密’引出胜吕的‘窥视者视线’,诱惑了他,如果这个诱惑的结果是‘恶’的话,那么她通过作为‘恶’的诱惑者建立了她的主体性”。<sup>⑥</sup>“你避开了另一个不想去探讨的世界……恶啊!就是那个恶,罪和恶是不同的”<sup>⑦</sup>假胜吕的指责实

①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3页。

② [英]迪伦·埃文斯主编,李新雨译:《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③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3页。

④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页。

⑤ 远藤周作『ひとりを愛し続ける本』講談社、1992年、69頁。

⑥ 菅聪子「<スキヤングル>としての女——遠藤周作文学における女性像をめぐるささやかなノート」敍説2008年、第3号、27頁

⑦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60页。

为胜吕主体的觉醒，“恶”是实践丑闻的欲望和冲动，是一种“拒绝向上，指向下坠的欲望”。<sup>①</sup>成濑讲述传递了他的创伤和战争记忆，在他去世后，成濑夫人充当他的角色，在和素子等人的关系中继续这种关系模式，她内部属于禁忌的冲动一面，在关系的反复建构中获得了愉悦，也找到主体认同的方式，同时，成濑的创伤和记忆被传递，可见远藤有意拉近普通人和战争之间的距离。

她觉得活得有意义的并不是每日的生活，也不是以街头画像者的身份等待客人来，而是只有委身于那种冲动时，她才真的感到快乐，假如沉溺在漩涡中死去是她唯一的愉悦。是唯一有意义的事的话，我又怎么阻止得了？<sup>②</sup>

素子是成濑夫人的情人，她渴望死，并在画中描绘被男人虐待时的感受，可见她是一位和丑闻共生的女性。被虐待可使她获得享乐，但享乐在获得后会立马丢失，主体陷入一种小死（petite mort）的状态。死亡不对她主体产生威胁使她焦虑，反而是她最重要的享乐方式，她一次次沉溺在死亡所带来的力量和享乐之中。可以说，死亡是她拥抱自由、确立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她通过对生的否定来完成生的意义，因此，她最后选择了自杀。素子的主体内不存在压抑的和禁忌，而成濑夫人和胜吕的主体内部都为禁忌预留了空间，这里是欲望和禁忌的博弈之处。素子势必影响胜吕主体对这种博弈的处理，这便是素子对待死亡的颠覆性意义。

#### 四、实践丑闻与确立自我

素子以死亡的极端方式打破了男性话语对主体的束缚，彰显了女性话语强烈的存在感。与之呼应，东京的夜晚迎来了一场大雾，寻找胜吕未果的小针在雾中看到了一男子的身影。

那是胜吕，但不是文学奖颁奖典礼或演讲会、电视上侃侃而谈的胜吕，而是系井素子画的胜吕。从他的侧面看得出傲慢、狡猾，还有下流的表情。<sup>③</sup>

大雾隔断了主体之间直接的相互理解，小针认定男子为胜吕并拼命追赶，最后未抓住男子，反而听见身后传来阴森的笑声，随后笑声变为“长长的啜泣”。<sup>④</sup>实在界中不受法则约束的假胜吕是不会哭泣的，因此小针看到的并非假胜吕。但小针实锤胜吕丑闻的欲望是真实的，大雾如同一面镜子，被追逐的客体其实是他主体的镜像，男子的表情无不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哭泣的声音来自在男权竞争下的失败。与此同时，胜吕也在梦中迷失在雾里，对死亡与丑闻的恐惧和不安，制造出了追逐他的脚步声，这是男性话语带来的不安。可见以雾为镜映照出的均为男性话语体系中主体的欲望，是小写的他者。在这种主客欲望结构中，主体的欲望总不能被满足，这种欲求不满带给主体以创伤性体验。而与之相反，接下来在雾中出现的光源里，胜吕的主体欲望被满足。

①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59 页。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4 页。

③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93 页。

④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94 页。

这时,他感觉雾开始微妙地发光,(中略)在全身被深深的、柔软的光包围的瞬间,五体感到一股无可言喻的舒服,(中略)啊!这就是死亡。死亡就是这样子吗?(中略)我的心是柔和的,因此请接纳我。那声音如老神父的声音,但又像是别人的声音。<sup>①</sup>

这场雾带有死去的素子的意志,素子的欲望超越了父权制大他者的欲望,享乐也独立于象征秩序,因此素子超越了大他者本身,成为象征秩序的大他者之外的绝对他者。她凭借女性话语在象征秩序之外发出实在界之光,即为雾中光源,这个光源穿透了父权秩序的一切,带着实在界的神秘和原初的享乐,夹杂着对美丑和善恶的凝视,打破了小针和胜吕二人原本处在男权中心话语里的欲望结构。“无可言喻的舒服”的实感是一种温暖和安全感,在这种感觉中,主体恢复了从容和自信。在这种状态下,主体得以圆满和充盈,进而达到基督宗教所讲的圣化,这也是主体在人性的光辉中,所能达到的信仰状态的极限。胜吕以一种圣化的方式在光中凸显了自我的存在,在光中,胜吕无畏丑闻,因此他也不再惧怕死亡,死亡的临近所造成的丑闻的紧迫性也消失了。可以说,这种状态给予了胜吕迎接死亡的勇气。他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害怕的东西竟然和想象中完全不同。胜吕彻底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接纳了死亡,主体获得了向死而生的力量。胜吕进而也开始接纳长久以来在压抑中逐渐浮现的冲动和欲望,也就是说他开始接纳了恶和丑闻。而最后的“请接纳我”的声音便是实在界中假胜吕对他发出的邀请。

成濑夫人将素子的遗物,也就是为胜吕作的肖像画送给了胜吕,胜吕当即否认这是他的画像,成濑夫人没有反驳他,称这是假冒他的人,并提出要安排两人见面。为了摆脱小针的纠缠以及骚扰电话,胜吕决定和假冒者见面。见面当天,成濑夫人特地安排了一套由两间卧室组成的窥视屋,她让胜吕通过其中一间卧室的衣橱中的小孔,窥视另一个房间中因醉酒而睡去的少女森田蜜。胜吕在酒精的作用下,看到“有一个男人压在蜜的身上”<sup>②</sup>正在侵犯蜜的身体,胜吕在这个男人的背部看到了和自己背部一样的伤痕,同时,男人体会到的感觉直接传给了胜吕,这使胜吕意识到男子是他自己。此时,胜吕实现了对被压抑欲望的释放和恶的逾越,进而在现实层面实践了丑闻,这是胜吕长久以来不敢实践的“罪”和不敢在小说中书写的“恶”。

胜吕贴近蜜的身体并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由此唤起了他记忆中的“美和善的旋律”,这是想象界中令主体迷恋的理想的美和善。随后,胜吕在蜜的身体上疯狂地吸着生命的气息,他产生了混合着对蜜生命的嫉妒的快感,“他不由得将手放在少女的脖子上,那时,他的内部听到和刚才不同的声音”。<sup>③</sup>这声音来自假胜吕所处的不可言说的实在界,接近实在界的胜吕被“更混沌的冲动之漩涡吸住”,<sup>④</sup>像是失去了意识从而变得疯狂,疯狂地舔舐蜜的身体,在这种状态下主体被象征界压抑的欲望得到了释放,他开始用力捏蜜的脖子,“好难受啊,先生……

①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97页。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3页。

③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页。

④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



请放手”，<sup>①</sup> 蜜向胜吕发声求救，语言的介入使胜吕恢复了理智，他的主体得以逃离实在界而被挤入象征界，并获得了一种抵抗恶的力量。胜吕通过靠近不可言说之物，克服了对实在界的恐惧，驯化了实在界。和蜜之间发生的事情使假胜吕的主体嵌入到了胜吕的主体中，胜吕主体的空缺被填满，成为了充实的主体。恶和丑闻对他来讲已不再构成威胁，他的主体获得了应对丑闻侵入的能力。

胜吕拥着少女走出宾馆的场面被守株待兔的小针用相机拍了下来，小针威胁胜吕说要曝光这一丑闻。虽然这张照片是胜吕丑闻的决定性证据，但此时的胜吕已经坦然接受了丑闻，即便照片曝光他也无所畏惧。面对小针的威胁，他没有否定也没有辩驳，而是在雪中静静地离开了。此时胜吕看到假胜吕伴随着柔和的灯光，迎着风雪，走在他的前方，像是在引导他前行。胜吕望向他的背影，跟随着假胜吕的脚步，随后，“那光充满爱与慈悲，如母亲般温柔地把男人吸进去，男人的影子不见了”。<sup>②</sup> 假胜吕在胜吕的主体内打开了人性欲望之恶的空间，光象征着主动介入人类救赎的天主之爱，假胜吕在光中回归到胜吕的主体内部，并得到了净化。胜吕由此接纳了恶和假胜吕，完成了主体的充盈。

在小说的最后，出版社的社长把小针的照片买断，这样一来，胜吕的主体有可能回到起初的纯洁，但胜吕“没想到是以这种结果落幕”。<sup>③</sup> 即便照片被毁，丑恶的一面仍在他主体内，因此他深知自己不可能也不愿回到之前的状态。在小说的结尾，象征着威胁的电话声依旧响起，但此时主体已经经历了象征界和实在界之间反复的如同炼狱一般的熬炼，坚守并丰盈了自己的想象界，即便不被象征界理解，但他的想象界已经获得了一种能量，来对象征界的规训和格式化，主体进而获得了内部的自我充实，成就了极富弹性的饱满的自我，达到一种个体的、想象的、可以消化象征界僵化东西的状态，这种状态同样也是胜吕在他的信仰世界中追寻的圣化状态。

## 五、结 语

远藤周作反复强调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是描写人而非护教。在和佐藤泰正的对谈中，他指出：“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名德国军官白天在集中营中将两千人送入毒气室，晚上回家聆听莫扎特的音乐，他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复杂，尤其是恶的一面值得深究”。<sup>④</sup> 与此类似，普通日本人为何会在战争中沦为杀戮者，这和意识形态相关，但又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远藤认为道德会随着社会环境而变化，例如战争中的道德准则无法适用于战后社会，但人心更深次元的某些东西并不会随社会状态和制度的变化而改变，这是潜藏在人类心底被压抑的本能的欲望

（下转第 60 页）

①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56 页。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62 页。

③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6 页。

④ 远藤周作、佐藤泰正『人生の同伴者』岩波書店、2006 年、228 頁。

---

---

# “面向新时代的国际日本学研究”

## ——第三届中日关系青年学者论坛综述

王奕斐

2022年9月24-25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第三届中日关系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东芝国际交流财团提供资助。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学院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法政大学、帝京大学、千叶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中日两国青年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面向新时代的国际日本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这一主题展开了为期两天的讨论。

24日的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贺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日本东芝国际交流财团专务理事大森圭介先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野田昭彦先生分别致辞,他们对与会各方表示感谢,共同表达了对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祝贺以及对国际日本学研究探讨的热切期待。

本次论坛有幸邀请到《人民中国》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王众一先生,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高洪研究员,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先生分别做基调演讲。基调演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研究员主持。王众一先生以《人民中国》的诞生缘由和变迁历程为中心,指出《人民中国》的创刊和定位调整反映了我国对日工作重心的变化,该刊见证了两国邦交自下而上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高洪研究员则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指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客观障碍以及中日两国学界应该努力的方向,并建议以宽广的大局视野和高远的理想目标来观察和思考中日关系。马场公彦先生结合自身担任岩波书店总编辑的经历以及中日出版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讨论了当前中日两国彼此认知的障碍,并对两国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以及知识分子提出了诚挚恳切的建议。

基调演讲之后,与会学者分别围绕方法与议题、思想与文化、外交与安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语言五个主题开始分场讨论。第一场方法与议题的讨论中,贺平教授以“日本学者的政治学研究——国际化进程与反思”为题,围绕日本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发文和被引用数量进行研究,指出日本政治学界已大体完成了阶段性转变,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存在感日增,并结

合日本过去二十余年的经验得失提出了几点启示。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专任讲师高田圭认为,随着“国际”的含义和海外“日本学(地域研究)”的实际状态发生变化,日本的“国际日本学”也发生了变化,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深化。帝京大学外国语学部专任讲师周雨霏、东京都立大学国际中心副教授嶋内佐绘、千叶大学国际未来基干机构专任讲师陶波分别围绕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挑战与对策、跨语言书写以及亚洲研究的新方法——Global Asias 进行了发表。

第二场的讨论以国际日本研究的思想与文化为主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谭仁岸对中国日本战后文学批评研究的现状与限度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批评史研究的思想文化史构想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来自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的谭皓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邱静副教授则聚焦于人物的研究,二人分别讨论了竹内好在华留学生的生活以及鹤见俊辅的“实用主义”研究实践。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康昊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商兆琦的研究集中于日本的中世和近世的政权,他们分别讨论了日本中世纪王权的建构和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政权构造。

第三场讨论围绕日本的外交与安全展开。东京大学佐桥亮副教授探讨了东亚的安全保障与中日关系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蔡亮研究员对岸田内阁介入台湾问题的特征与影响进行了考察。早稻田大学张望副教授则指出,中日关系经常陷入周期性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自各个政策领域的认知差距而导致的猜疑所造成的,所以他梳理了五十年来中日之间存在的战略互疑并为未来的中日关系的理想状态提出了建议。辽宁大学田凯教授和南京大学比屋根亮太分别讨论了日美的军事技术合作和中日学界对驻冲绳美军研究的情况。

25日,论坛继续进行。第四场有关日本政治与经济的讨论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陈友骏梳理了日本经济外交思想的渊源、重构、发展以及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思想的演变,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进行了总体评价。碳排放问题是当今全球共同面临的共同生态问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宫笠俐研究了“双碳”目标下日本能源结构转型与气候政策困境,指出日本需要强化其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气候行动,以实现其长期目标。上海交通大学尹月和复旦大学姜茗予两位老师则分别聚焦于日本的移民和老龄化劳动力问题,对日本移民政策的态度、意识形态、选举权以及老龄化劳动力的生产和工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五场讨论的主题是日本的历史与语言。复旦大学王升远教授梳理了战后初期“开除公职”风潮中的尾崎士郎的活动,并从中探视言论界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山东大学胡炜权副教授则以专业用语的中文翻译为中心,讨论了当下中国日本史教育的问题,他指出日本史的教育需要统一日本史各个领域的概念和用词,并进行清晰的界定和说明,而且要借鉴欧美学界的经验,并积极与日本学界展开交流,提升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水平。明治学院大学佐佐木雄一副教授则对不同时期日本外交史的研究动向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对今后日本外交史研究的问题与趋向进行了评估。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王侃良从语言思想史的视域,以汉文

训读为例,探讨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新方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丁诺舟则从起源、类型、思维逻辑与社会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战”攻势。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学子的交流,本次论坛特别设立两场博士生论坛。来自复旦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围绕东亚金融一体化、日本对华认知、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情报搜集、历史遗产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修宪现状、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的签署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交流。

在论坛闭幕式上,日本东芝国际交流财团专务理事大森圭介先生、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先生对各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广涛代表主办方对论坛顺利举办提供支持的各相关单位和个人表达了感谢。



(上接第 57 页)

和冲动,是人性之恶。<sup>①</sup>对恶的凝视,使远藤在作品中发出了“自己和残杀者又有何不同”<sup>②</sup>这一对人性的叩问。这一叩问具有极强的时代色彩。小说中胜吕和成瀬俊夫个人层面无法言说的创伤,揭示出的是二战后日本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创伤,无可言说的创伤一旦诉诸语言便成为丑闻,因此个体掩盖创伤,集体涂抹记忆。而远藤继承了战后派作家对战争的反思,用书写对抗忘却,深入人性层面,打开创伤,让创伤诉诸于小说中话语的言说,试图为个体和战后日本民族寻求救赎之路。展现了追寻自我、直面丑恶、期待救赎的人性之光辉。

---

① 远藤周作『ひとりを愛し続ける本』讲谈社,1992年,57页。

② [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丑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页。

---

---

# “留日学人和中日关系”

##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姜茗予

2022 年 11 月 26-27 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留日学人和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心成立以来连续举办的第 32 届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26 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平主持。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文化部部长米田麻衣、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野田昭彦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洪研究员、东京大学丸川知雄教授发表特别演讲,同济大学蔡建国教授主持。

高洪研究员从宏观层面围绕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学术等,阐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留日学人与两国关系历史发展轨迹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指出,为认真落实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达成的各项共识、开展务实合作、努力沟通交流,需要各方人士携手推进。有鉴于此,新一代留日学人更应倾尽全力,发挥自身独特作用,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好中日两国各领域、各层面沟通交流的桥梁。丸川知雄教授讨论了赴日留学生的历史与现状,并就今后日本走向移民社会提出了政策建议。他指出,国籍认定和外国人地方参政权等问题是今后日本走向“移民社会”的道路中必须要探讨的课题。

随后,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浙江大学王勇教授,早稻田大学青山瑠妙教授,以及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刘建辉教授发表基调演讲,基调演讲由复旦大学包霞琴教授主持。

川岛真教授阐述了留学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以及留学史研究中需注意的要点。他指出,在留学史的研究中要注重超出友好或非友好的框架,客观地分析留学的动机、过程及意义。他认为,研究者需要运用宏观理论并利用统计数据 and 日记等资料,对每个个体的思想进行具体且深入的探讨。王勇教授以朱舜水为个案,对朱舜水与日本文人的笔谈资料进行了研究,并论述了其中折射出的思想内涵,即强调儒教的正统、东亚礼仪的规范,以及学习为治国根本等。青山瑠妙教授介绍了早稻田大学和中国之间留学人员的交流情况。她指出,培养对国际形势、国际关系有深刻理解的人才,是缓解两国之间的矛盾并增进合作的关键,对今后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建辉教授梳理了 1964 年至今中国的主要日本问题研

究机构和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日本研究人才培养方法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当时的决断,对其后中国的日本研究和中日交流发挥了重要影响。

基调演讲之后,研讨会进入分科讨论环节。第一场“留日学人与中日人文交流”专题,由上海杉达学院日文系主任胡志昂教授主持,上海商学院日语系洪伟民教授点评。

张纪浔教授介绍了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主要包括日语学习、留学日本、教育和社会工作等方面。他指出,日本的很多经验都值得借鉴,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将日本的经验传给中国,推动中国的发展和建设。熊达云教授探讨了清末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留日学人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修订法律馆和宪政编查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打下了基础,其中留学日本的学生和具有日本考察经历者在协助外籍法律顾问工作、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教育培养法律司法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高士华教授以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留学日本史的研究为主题,强调关于留学日本史的研究工作,各高校应该共同协力,完善相关资料和数据保存和共享工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林昶研究员从留日学人与早期日本研究刊物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日本研究刊物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他指出,留日学人为早期中日人文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今天的日本研究中也展示了别样的风采。徐志民研究员以近代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政策为主线,探讨了各个时期留学政策的变化。他指出,留学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输出本国文化,增进留学生及其母国对留学对象国的感情,助力双边关系发展。田中祐辅副教授以神奈川县地方自治体的研修生培训项目为例,对两国通过语言教育进行的国际文化交流及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日本地方自治体的诸多项目,特别是与日语教育相关的项目,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场“留日学人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由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姜咪红副主任主持,同济大学蔡敦达教授点评。

汪鸿祥教授探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与留日学人的作用。他表示,应以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总结经验教训,回归原点初心,推动中日关系的升温回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日吉秀松教授指出,田汉、吴觉农等中国留学生对白莲出走一事给予的同情、支持和赞美,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个性独立的追求,以及对平等的渴望。两国的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相似的看法,与两国学人之间的交流是密不可分的。王敏教授表示,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周恩来和平研究所于近期正在东京举办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展。正在展览的画作描绘了日本皇室在中日文明融通之中的历史贡献,为中日两国人民以温故创新的方式来开创和平美好未来提供了历史参照。范云涛教授讲述了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以及中国通过完善外商投资和贸易相关法律制度解决这些挑战的过程和经验。沙青青副主任以 1977 年华侨王贞治在棒球比赛中破世界纪录事件作为切入点,介绍了邦交正常化前后中日之间开展的以棒球为抓手的体育外交。他指出,中日之间的棒球外交通常更多被视为外交关系改善所带来的成果,但也能

反过来促进双方民间感情的好转。

第三场“留日学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专题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茗予老师点评。

李春利教授论述了中日经贸关系和全球供应链的现状。他指出,如果日本进一步坚持经济安保或是以价值观为前提的供应链,随着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日本经济的发展道路会越走越窄。白智立副教授对现代化、日本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三个概念进行了深入解读。他指出,应结合留日学人的学术实践,从日本对现代化的认知出发,探讨现代化的内涵,思考中日现代化的共同规律。祝曙光教授以明治日本铁道与留日中国学人为题,探讨了近代日本铁道对清末民初留日中国学人的学习和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他指出,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开拓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袁丽晖副教授介绍了日本新冠疫情中的看护状况及对我国的启示。她指出,虽然疫情给看护工作带来了冲击,但也基本满足了大多数利用者的需求,以社区为单位的看护体制切实可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她还介绍了山口大学与中国之间的留学与交流活动。王广涛副教授探讨了日本排外主义的历史演变与政治逻辑。他指出,日本的排外主义团体自身主张有很多庸俗、无知、错误的内容,但是利用民粹主义和网络空间却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四场“留日学人与日本学研究”专题由复旦大学日文系邹波主任主持,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孙若圣执行主任点评。

君岛东彦教授从和平学的角度对中日韩三国的留学进行了探讨,具体包括多轨外交创造和平的方法、日中韩三国的留学项目及亚洲校园项目、三国学生和平对话的成果和可能性等。他指出,留学是创造和平的机会,期待以此可以形成东亚的共同身份认知。施小炜教授作为翻译家和文学研究者,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述了他对留学和创作关系的认知。他表示,留学生在日本的体验,应该在学习之上辅以工作和生活,如此才能加深对日本种种现象的理解。陈小法教授探讨了清末留日女学生赴日求学的过程,以及她们在日本学习的新知识、接受的新思想,阐释了这些经历对中国女性形成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意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伴野崇生副教授就日本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过程,以及留学生与多文化共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当今留学生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多元和复杂的,应该改善学习环境、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周妍副研究员通过梳理《似而非笔》的内容,阐述了章太炎首次访日期间与日本人士的交流轨迹。她指出,章太炎首次访日时间虽然不长,但接触了很多日本文化名人,是理解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学术与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广涛副研究员主持了闭幕式,蔡建国教授、君岛东彦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贺平副主任致闭幕辞。

蔡建国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他认为首先会议主题设计巧妙、专家参与度高——47位学者出席,27人发言。此外会议学术性强、涵盖面广,互有关联的四个专题具有层次感。他指出,因为中日文化的差异性,留日学人在加深两国相互认知与理解方面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他提出今后应该进行深度研究的六大问题:(1)留日学人日本观的形成;(2)留日学人发挥的实际作用;(3)留日学人如何融入日本社会;(4)留日学人在日本中的地位;(5)留日学人在消除文化隔阂、拉近两国民众心灵上所起的作用;(6)近代以来的留日史等。君岛东彦教授积极评价了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期待中日两国青年学者在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最后,贺平教授代表主办方感谢各位线上线下与会学者的支持,并表示了对今后线下相聚的期待。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佐藤训子领事出席了当日的研讨会。



# 中心大事记

## 2022 年下半年

- 7月1日 日本神户大学姜茗予博士入职中心,担任助理研究员(讲师)。
- 7月5-6日 贺平、王广涛参加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五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并作发言和点评。
- 7月30日 胡令远出席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浙江工商大学主办的“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题目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与四个政治文件》。
- 7月31日 胡令远出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联合举办的“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东亚的选择”国际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题目为《东亚政治形势与展望》。
- 8月1日 贺平专著《国际日本研究述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8月8日 王广涛应邀参加复旦大学学生会星空讲坛,讲座题目为《后安倍时代参议院选举以及日本和平宪法的走向》。
- 8月18日 胡令远、贺平出席中华日本学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分别作发言《向度与向量: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战略的蜕变》、《何谓“日本”,何以“国际”——“国际日本学”的机制建设及其反思》。
- 8月25日 王广涛应邀在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桥在线讲座,讲座题目《中日交流的历史与未来:以史为鉴、共同发展》。
- 8月27日 胡令远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社科论坛: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题目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务实与平衡》。
- 9月1日 王广涛日文专著《日中歴史和解の政治学》由日本明石书店出版。

- 9月3日 王广涛参加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大阪大学经济学部联合举办的“Industrial Polic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 A Comparative History”工作坊,并作评论。
- 9月13日 我校周桂发研究员莅临复旦·三井系列讲座,发表题为《复旦名师名联书法艺术赏析》的主题演讲。
- 9月23日 王广涛参加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的“当前东北亚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并发言,发言题目《多边遏制、政治领导与日本对华政策的走向》。
- 9月24日 胡令远出席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题目为《中日海洋问题的凸显与岸田政府的战略选择》。
- 9月24-25日 中心举办“第三届中日关系青年学者论坛”,主题为“面向新时代的国际日本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来自国内外等近2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 9月25日 上海市日本学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联合主办“不忘初心 面向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在上海市赤松秀一等出席。上海市日本学会胡令远会长代表主办方做大会总结。研讨会的指导单位为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由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协办。
- 9月25日 贺平出席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22年年会暨‘中日经济交流50年’学术研讨会”并作发言,题目为《经济民粹主义与战后日本社会稳定》。
- 10月29日 胡令远出席同济大学主办的“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作特别纪念演讲:“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与赓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 10月29日 王广涛参加漓江出版社与大隐书局举办的《同盟的真相》新书分

- 享会。
- 10月31日 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黄峰会长莅临复旦·三井高端讲座,发表题为《不确定性的外商对华投资》的主题演讲。
- 11月1日 王广涛参加国际问题研究院第52期“国研沙龙”,发表题目为“日本右倾化发展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11月5日 王广涛参加海国图智研究院主办的“海图博士生论文工作坊”并担任评论。
- 11月6日 胡令远主讲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讲座“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公明党”。
- 11月9日 王广涛参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策划的“启微读书”系列沙龙:“资本的游戏——日本财阀的历史与现状”。
- 11月10日 胡令远主讲上海杉达大学建校30周年纪念学术讲座:“国之交与民相亲”。
- 11月14日 王广涛参加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举办的青年学术沙龙并担任评论。
- 11月20日 胡令远出席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世界日本研究主要机构负责人国际研讨会”,就上海及复旦大学日本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方向作了交流发言。
- 11月24日 胡令远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日本研究青年论坛”并作评论发言。
- 11月26日 上海市日本学会胡令远会长出席上海甘泉外国语学校日语教育50周年纪念活动。
- 11月26-27日 中心举办主题为“留日学人和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心成立以来连续举办的第32届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 11月27日 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胡令远出席学会年会暨换届选举会议。
- 11月30日 胡令远出席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举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
- 12月2日 王广涛参加世纪文景与浦东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读书会:“回到鲜活的历史现场——自叙传的魅力”。
- 12月6日 胡令远出席第18届“北京——东京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 12月7日 上海市日本学会胡令远会长出席上海市对外友协与上海市白玉兰奖获得者联谊会共同举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 第九届上海日本白玉兰会交流会并作主题言。上海市外办主任张小松、市友协会长陈靖、中国驻日使馆公使宋耀明、中国前驻日大使程永华、日本驻沪总领事赤松秀一、大平正芳原首相外孙女渡边满子等出席活动。
- 12月9日 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上海事务所福山光博副所长来访,双方就日本企业在华投资、长三角一体化、中日经贸关系以及未来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 12月13日 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共同主办“日本与中日关系:形势分析及研究方法”研讨会,胡令远出席并作主题报告,贺平、王广涛在分组讨论中作报告。
- 12月20日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陈子雷教授莅临复旦·三井高端讲座,作题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与日资企业的发展机遇》的主题演讲。
- 12月22日 胡令远出席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论坛联合主办的“中日对话:从中日50年关系解读未来50年”国际研讨会,做“近年日本对话安全观的误区及其成因”主题报告。

(王广涛)